今天 2012年春季号 总 96 期

目 录

“飘风”特辑

格 非	隐身衣
刘 禾	六个字母的解法（选章）
李 陀	无名指（选章）
欧阳江河	凤凰
翟永明	随黄公望游富春山（选章）
西 川	万寿（选章）
北 岛	歧路行（选章）

隐身衣

格非

KT88

早上九点，我准时来到了褐石小区的一幢公寓楼前。这个小区就在圆明园的东侧，北边紧挨着五环路的高架桥，因为轰动一时的“周良洛案”，它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变得尽人皆知。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到这里来。我给八号楼的一个客户做了一台KT88的电子管功放，用来推他刚买的阿卡佩拉书架箱。阿卡佩拉带喇叭花的Campanile，在北京城并不罕见，开声时高音单元闪着幽蓝的弧光，有点神秘莫测；可新出厂的这款书架箱，我只是在发烧音响杂志上见过照片。为了制作一台足以与她相匹配的电子管功放，我没日没夜地干了两个星期。但说句实话，能不能推出好声音来，我心里可是一点都没把握。

秋已渐深，雨后的天空开始放晴。空气的能见度很高，仿佛你只要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圆明园探出院墙外的烟树和百望山的宝塔。如果再下一两场霜，西山一带的枫叶大概就要红了吧。可我的心情，却不像天气那么好。就在五分钟之前，我接到了姐姐崔梨花打来的一个电话。姐夫昨晚喝了太多的酒，他用大头皮鞋直接踹她的“要害”。今天早上，姐姐就开始尿血了。她的哭诉令人厌烦，我照例一声不吭。我倒不是不想安慰她，因为我感觉到她的哭诉后面，藏有另外的隐情。果然，哭到后来，姐姐忽然就对我说出了下面这一段话：

“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就行行好吧。我也不想这样。看在姐弟的情分上，你就可怜可怜我吧，算我求你了……”

她在电话中哑哑地向我喊叫，语调中既有哀求，也有愤怒。就好像用大头皮鞋踹她“要害”的，不是混蛋常保国，而是我似的。

我刚挂了电话，三单元的那扇防盗门就推开了。一个身穿灰色运动衫的女人，从门里探出半个身子，瞅了瞅我，又瞅了瞅停在门前的那辆泥迹斑斑的金杯车。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了那款KT88上，笑了。

“呵，还挺漂亮！”她随口说道。

你可以把她的这句话理解为一种礼貌的赞叹，也可以当成一种淡淡的揶揄。她说话的样子有点像玉芬。脸型和身材也像。我忍不住多看了她两眼，心里就有些恍惚，也有点伤感。我费尽心思制作的这台KT88，就搁在门前的水泥台阶上，它那银灰色的机身，在早上清明的阳光下，熠熠发亮。

向我订购这台胆机的人，是她的丈夫。我是在去年十月底的国际音响展上认识他的，人很矜持，也有点腻歪。我只听说他是一位教授，具体是研究什么的，在哪所大学任教，我就说不上来了。他的主意一变再变。先是让我给他做一台EL34，机身差不多已经做出来了，他又打来电话，让我将它改成功率更为强大的KT88。

此刻，他正坐在光线黯淡的餐厅里，与一位朋友喝茶聊天。我抱着那台沉重的KT88，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并未中止与朋友的谈话，只是严肃地冲我微微颌首而已。据我跟教授们打交道的经历，我发现凡是有学问的人，总能轻而易举地让你自惭形秽。他的那位朋友呢，看上去也不是一般人。嘴唇上留着浓密的胡

子，看上去有点像恩格斯。

女主人还算热情，她问我是愿意喝茶还是咖啡。我说随便，她就果然随便了起来。稍后端来的，竟然是一杯橙汁。我在摆弄机器的时候，她就趴在长沙发的靠背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的样子，怎么看都有点像玉芬。

其实，我的工作很简单：在机身上安上英国 GEC 的 KT88 电子管以及美国 RCA 的 5u4 整流管，然后测定一下它的工作电压，再接上讯号线和喇叭线，就算完事了。我注意到，那对阿卡佩拉书架箱离墙近了一些，就问她能不能调整一下音箱的摆位。一般来说，扬声器离墙太近，导向孔形成的反射和驻波，会让低频有些发闷，这是常识。还没等女主人搭腔，那位教授在餐厅里忽然扭过头来，朝我很不友好地喊了一声：

“别乱动！”

女人朝我眨了眨眼睛，吐了下舌头，笑着说：“就这样吧。别管它。他从不让人动他的东西。咱们，放首音乐来听听，怎么样？”

“不急，再等一会儿。电源刚接上，机器还没有煲开。”

“呵，这么复杂！”仍然是那种一半是好奇，一半是揶揄的口吻。

我只得耐心地向她解释，为了让胆机发出好听的声音，预热的时间一般不能少于二十分钟，这是我的原则。她也是一位教师，在附近的体育大学教学生打排球。我简单地打了个比方，她立刻就理解了“热身”的重要性。

在等待机器烧热的这段时间中，我开始一张一张地翻看茶几上的那摞 CD 唱片。都是些过时的流行音乐。不是梅艳芳，就是张学友，当然还有蔡琴。其中大部分是盗版。我对客户们的音乐趣味没有什么意见。你是喜欢文艺复兴、巴洛克，还是浪漫派，抑或是爵士、蓝调，甚至是录音极其夸张的“鬼太鼓”或“打碎玻璃”一类的发烧碟，我一概都无所谓。可是，说实话，花上将近 15 万元，购置一对小小的阿卡佩拉书架箱，用来听盗版的梅艳芳，多少有点不可思议。同时，我也悲哀地意识到，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耗费那么多的心力来使这款功放尽善尽美，简直有点自作多情。其实，若要听这一类的玩意，你只需花上 500 元，到海龙电子市场，配一对廉价的电脑音箱就足够了。

当然，我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委婉地问她用什麼唱片来试音？女人说，她无所谓。反正他们家全部的“音乐”，都在这茶几上。

教授和他的朋友仍然在客厅里小声地闲聊。一般来说，知识分子间的谈话，你是很难听得懂的。你听不懂也没啥奇怪的，但他们说话时那种郑重其事的腔调和口吻，却不由得你不着迷。那是一种能够让任何荒唐的观点立刻变得入情入理的腔调。比如说，那个长得像恩格斯的人，不知怎么搞的，忽然就夸奖起慈禧太后来。他说：

“幸亏当年，慈禧太后贪污了海军用来造军舰的一笔款子，在西山脚下修建了颐和园。要不然，甲午硝烟一起，还不照样他妈的灰飞烟灭？由此可见，贪污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你不得不佩服慈禧她老人家的远见。经她这一折腾，且不说为我们留下了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单单是门票收入，一年下来是多少钱？我就住在颐和园的西南角，只要不下雨，我每天下午都骑自行车去园子里转转，从南如意门进去，从北宫门出来。二十年下来，嗨，四季美景，怎么都看不厌……”

一听他说起慈禧，我的精神突然为之一振。我的曾祖父曾进宫给慈禧唱过戏，还得到过她老人家赏赐的两匹绸缎。听他这么公开为慈禧翻案，我心里着实挺受用——再说，我也很迷那个园子，尤其是玉带桥附近的山水风光。只是近些年来，门票一涨再涨，屈指一算，我差不多已经有七八年没进去过了。关于慈禧，我祖

父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听上去要比“恩格斯”客观得多。他说，慈禧的精明过人，自然是不消说的，但这个人，却没有大的识见，也就是说，小地方精明，大地方昏聩，不过一庸常妇人罢了。她没能把握住朝代更替之际的历史机遇，在选择保大清，还是保国家这件事上，她悲剧性地选择了前者，被人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一点都不冤枉。

听罢“恩格斯”的一番高论，对面的那位教授频频点头。可教授接下来的一番话，听起来却多少有点离谱。他表示很认同对方的看法。甚至，他认为连抗日战争也完全没有必要打。如果在开战之初就立刻缴械投降的话，少死几千万人不说，中国和日本联起手来抗衡欧美，世界格局也许会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他一直认为，和李鸿章、袁世凯一样，汪精卫这个人，也是位不可多得的民族英雄，应该重新评价，予以彻底平反。他还引用了一段“珍珠港事变”爆发时汪精卫所写的日记。

他很喜欢用“不是吗？”这样一个反问句，来强化自己的观点。好像一旦用了这个反问句，他那耸人听闻的陈词滥调，就会立刻变成真理似的。

虽说我不能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虽说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去反驳教授的观点，虽说我对知识分子一向尊敬，但听了他刚才的那番论调，我心里立刻就升起了一股无名火来，怎么说呢？他的话让我感到屈辱，就好像别人挖了你家祖坟似的，我很想过去与他争辩一番。而且，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在大肆吹嘘日本的“神道教”如何了得的时候，把“神祇”的“祇”竟然说成了“抵”。我虽然只念过一年电大，我的绝大部分文学知识，都来自于徐中玉先生主编的那本《大学语文》，也还知道那个字不读“抵”，而应读作“奇”的。

我拼命地克制住自己的冲动，从茶几上那堆垃圾中挑出了一盘《红色娘子军》，准备试音。可教授夫人忽然又问我，能不能换一张。她最喜欢刘德华。她告诉我，在2004年的工体演唱会上，她差一点就有机会跟刘德华握上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便固执己见。但你可以想象，当“给我一杯忘情水”这样轻佻的哼唱，从珍贵的阿卡佩拉扬声器中发出来的时候，到底是怎样的情形。

我浑身上下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心情也坏到了极点。

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刘德华就不能听。可如今的情况是，人不分老幼男女，地不分南北东西，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听刘德华。我就是把脑子想穿了，也搞不懂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世界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彼尔·金特》

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一个专门制作胆机的人。在北京，靠干这个勾当为生的，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二十个人。在目前的中国，这大概要算是最微不足道的行业了。奇怪的是，我的那些同行们，虽说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却老死不相来往。既不互相挖墙脚，也不彼此吹捧，对于同行的技艺从不妄加评论，各自守着有限的一点儿客户，聊以为生。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我们这伙人的存在。这倒也挺好。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

我不太喜欢“发烧友”这个称谓。我不过是一个手艺人。说实在的，多年来，我心里一直为此感到自豪。你知道，现如今，论起手艺人的地位，已经与乞丐没

有多大区别。那些学问渊博的知识分子，对眼下这个社会的变化，也许能解释得头头是道，可依我粗浅的观点来看，这个社会的堕落，正是从蓄意践踏手艺人开始的。

不过，说起我们这个行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也曾火爆过一阵子。那时候，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音像展居然人潮涌动，门庭若市。你似乎很难理解，那么多的巴赫迷、瓦格纳迷、富特文格勒迷、卡萨尔斯迷，到底是从哪儿钻出来的。那时候，你与文人雅士们打交道，人人都以听流行音乐为耻（坦率地说，这也有点过分）。即便大家都在谈论古典音乐，你若是想要让别人对你心怀敬意，甚至连贝多芬和莫扎特都羞于出口。要谈就谈更为冷僻的泰勒曼、马勒或者维奥蒂，哪像今天，居然连李宇春也听得津津有味。

那时候，北京音乐台的 97.4 调频立体声，还专门制作了一档叫做“发烧门诊部”的节目。每当节目播出时，我都会掩上房门，关掉电灯，让自己完全沉浸在黑暗之中，用自己组装的收音机收听这个节目。那时，我还住在椿树街的老房子里。当那些奇妙的音乐从夜色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变得异常神秘。就连养在搪瓷盆里的那两条小金鱼，居然也会欢快地跃出水面，摇头甩尾，发出“啵啵”的声音。每当那个时候，你就会产生某种幻觉，误以为自己就处于这个世界最隐秘的核心。

两年后，我制作的胆机开始有了固定的客户。我还被请到了北京音乐台的录音室，担任过“硬件医生”一类的嘉宾。可是现在呢，不用说“发烧门诊部”这档节目早已无疾而终，假如你在开车时偶尔想从收音机里听一点古典音乐，简直比中彩票还要难！不知为什么，现在的节目主持人，似乎更热衷于说话。他们一刻不停地说着废话，还人为地弄出一些夸张的笑声或掌声来，就像在话筒前自己胳肢自己，真是无聊透顶。

总而言之，九十年代的古典音乐氛围，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我的妻子（当时还是女朋友）在河北职业技术学校读中专，她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我提到过，在她们学校，每天广播台播放的第一首曲子，竟然都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彼尔·金特》中的“晨曲”。你可以想象，每天清晨从这样一个旋律中醒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好吧，我现在不妨就来说说我的妻子。

和她相识的那会儿，我还不曾进入发烧器材这个行当。那时，我还在王府井的“同升和”卖鞋呢。玉芬第一次走进我鞋店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她了。你没法不注意到她。她有一张纯洁而俏丽的脸，你每看它一眼，心里都会被锋利的刀片划一下。怎么说呢，有一种想豁出命去跟她好的冲动。她一连试了三、四双皮鞋，都觉得不合适。既不买，也不走，一个人坐在试鞋的小皮凳上，哀声叹气。

我暗暗地观察了她好一阵子，眼看着门外的街道沉沉地黑了下来，游人逐渐散去，成群的乌鸦在树枝上不停地哀唳。到了打烊的时间，我心里还惦记着去宽街给母亲抓药，只得朝她走过去，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她说：

“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脚？”

大凡人在遇到烦恼的时候，很容易受人暗示，听人摆布。她顺从地仰起头，看了我一眼，对我的莽撞和唐突毫不在意，撅着嘴问我道：“你要看哪一只？”

我说，随便哪一只都行啊。

她立即脱下了那双飘马运动鞋，甚至毫无必要地褪去了丝袜。我朝她的那只右脚瞥了一眼，转身从货架上取下两双鞋，供她挑选。她试了试，立刻就决定把

两双都买了。那天临走时，她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

她在西单和王府井的鞋店转悠了一整天，千挑万选，没瞅见一双中意的，而我呢？居然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随手为她挑了两双鞋，都那么合脚，就像是专门为她定做的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也许是心情比较好的缘故，我一得意，接下来的回答，你还别说，听上去怎么都有点格言的味道：

“一点都不奇怪。人总是在挑选不适合自己的东西。”

其实，从后来的事情来看，这句话根本不是什么格言，反而有点像谏语。玉芬第二次来店里买鞋，我就提出带她去儿童剧院对面的全聚德吃晚饭。她居然同意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又约她一起看了场电影。她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随和得有点让人心里发憊。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就像是隔着一层雾在看她似的。在我们开始交往的头两年里，我们从来没有拌过嘴，她也从没有为任何事情显露出厉眼疾色。她这种人，仿佛就是为了一刻不停地赞同别人而存在的。

我的好朋友蒋颂平曾感慨说，咱北京的姑娘，多少都有点“虎妞”的秉性。一不高兴，随时都会脱下鞋子来砸人。看来，这句话也不怎么靠谱。我也曾带玉芬去颂平那里玩过一次。他对我的“好运气”感到难以理解，甚至还有些愤怒。他当着我的面，站着跟玉芬说话时，身体都会不由自主地往前倾。

原来，还真有“为之倾倒”这回事啊。

九十年代末，我靠着给别人定做胆机，慢慢积攒下来一笔钱。有了一点家底之后，我立即从“同升和”辞了职，在“超音波”租下一间门面，加盟香港的一家音响销售公司，开始专门代理英国的“天朗”扬声器。那时候，在北京的音响市场里混，你想不赚钱都难。没过多久，我就在上地东里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觉得有足够的底气向玉芬求婚了，就带她回家见我母亲。实际上，是想让母亲为我感到骄傲。

母亲当时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但说起话来，仍不乏幽默。我把玉芬带到母亲房里晃了晃，就让她去厨房帮姐姐做饭去了。我一个人待在母亲床边，有些得意地问她老人家，对我带回家的这个儿媳妇是否满意。老太太想了半天，抓住我的一只手捏了捏，笑道：

“这丫头，卖相好。”

这句话我可不爱听。什么叫做“卖相好”？让人听上去很不是滋味，像是在评价刚出栏的一窝小猪似的。过了半晌，母亲喘了喘气，又说了第二句话：

“这丫头，脾性好。要说人品呢，倒也还善良仁义。”

听母亲这么说，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满心以为她是在夸玉芬呢，心里的那个高兴劲儿，嗨，就别提啦。可母亲歪在床上，披着一件老棉袄，咳了半天之后，忽然用手拍拍床沿儿，示意我坐下来，坐在她的手能够得到的地方。谁知道，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忽然对我说：

“孩子啊，你要是不在乎我的意见，就当我是放屁。要是真的想让娘给你拿个主意呢，我劝你，最好不要跟她结婚。这丫头，我替她细细地相了面，样样都好，可有一件，没有定星盘。”

我问她，“定星盘”是什么意思。她是江苏盐城人，说话时经常夹杂着一些方言，有点不太好懂。母亲想了想，仍然笑着对我说：“这丫头，就是有点水性风流。不好。说句难听的话，你这个婆娘，有一多半是为别人娶的。咱们这样的

人家，消受不起啊。”

她随后还说了一句谚语：“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走。”愣是把我给逗乐了。

不过，那年国庆节我们成婚时，母亲倒也没说什么。既不阻拦，也没把不痛快挂在脸上。当姐姐领着新娘子走到她床边，改口叫妈的时候，母亲不仅高声答应，还笑咪咪地强撑着要坐起来答礼。她把早就压在枕头底下的两百元礼钱，郑重其事地递到玉芬的手中，还顺势搂了她一下。

母亲的话被应验，已经是四年以后的事了。

有一天玉芬下班回家，柔声细气地提出跟我离婚。她要离婚的理由，居然是和她们单位新来的一位主任“好上了”。我一个人在阳台上抽了两包烟，还是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便去卧室将她推醒，低声下气地请她“再考虑考虑”。玉芬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没头没脑地说了句：

“还考虑什么呀？亲爱的，我跟他已经那个了呀。”

我没办法，只好一个人走到厨房，用水果刀在自己的手背上扎了个窟窿。

和玉芬闹离婚的那些日子，母亲的生命也快要走到了它的尽头。左邻右舍，包括她以前单位的同事，那些老姐妹，都来劝她赶紧去医院。母亲死活不依，只是静静地望着她们笑。老太太有她自己的盘算。她知道，这一次住了院，说什么也回不来了。另外，她也舍不得那点钱。最后，还是舅舅从老家盐城赶了过来，好说歹说，这才把她送进了医院。

在她从住院直至去世的十一天中，我偶尔也会到医院去转转，象征性地待个五、六分钟。玉芬的红杏出墙，搞得我心绪不佳。这一点，我姐姐崔梨花是知道的。

“可咱妈就要死了呀！”有一天，梨花跺着脚对我强调说。

我心平气和地对她道：“我也想死呀，你信不信？”

她见我整天都虎着个脸，拿我也没啥办法。她每天晚上去医院陪床，白天还要赶到石景山区的一家污水处理厂上班。那些日子，她眼睛总带着黑边儿，把自己弄得像只乌眼鸡似的。而我那姐夫，混蛋常保国，已经在亲戚朋友中到处败坏我的名声了。

我也只好由他去。

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母亲，她正处于服药后的昏睡之中。我不想惊扰她老人家休息，给姐姐递了个眼色，在床边站了一会儿，正要悄悄地拔脚离开，母亲忽然睁开眼，把我叫住了。

她执意把姐姐打发回家，让我一个人留下来陪她一晚。

“就一晚。好不好？”她嘻皮笑脸地对我说。

我自然也没什么话好讲。

不过，我在她床边熬了一宿，似乎没有多大必要。她能够保持清醒的时间，实在是少得可怜。在她醒来的时候，她总是让我帮她侧过身来，以便她的眼睛能一刻不离地看着我。说实话，我被她看得很不自在。母亲本来就个子矮小，生了病，身子又瘦了一圈，看上去怪可怜的。偶尔，她会抓过我的手，在我的手背上摩挲一番，脸色十分沉静，始终都带着一丝笑意。她积攒了一个晚上的力气，到了天快亮时，终于跟我说了一大堆话。

我记得母亲死去的那家医院，好像紧挨着部队的一个兵营。因为天色将晓时，我能清楚地听到附近营房里传来的起床号。当然不是《彼尔·金特》。母亲说，她知道自己就要走了，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现在她不想别的，能多看我一

眼是一眼。经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是挺难受的。她已经从姐姐的口中，得知了我和玉芬离婚的事。她没有责怪我当初没听她的话，而是淡淡地对我道：

“当初我就劝你不要跟她结婚，可是的？你不听，我也没多话。遇到那么一个从画上走下来的俏丫头，你心心念念都在她身上，我不是看不出来。我要硬是从中阻拦，你这小身子骨，怕也受不了。我心里说，也罢，先结了再说吧。不行咱就离，离了找个人再结就是了。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有时候，你眼看着自己熬不过去了，把心一横，硬着头皮一顶，也就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同你说，你也不要不爱听，这世上，人人都该派有一个老婆，天造地设的，命中注定的。不是玉芬，而是另一个人。她在什么地方呢？我也不晓得，你倒也不用打着灯笼，满世界地去找她。缘分不到，找也没用。缘分到了，她自己就会走到你的面前，跟你生儿育女。不是我迷信，你将来看着好了，一定会是这样。放宽心，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一见到她，心里就马上会想，哦，就是这个人……”

我打断了母亲的话，对她道：“您还别说，我当年见到玉芬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呀。”

母亲笑了笑，伸出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你这是鬼迷心窍！”

“万一我以后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女人，没把她认出来，怎么办呢？”我又问。

母亲想了想，忽然就流下了两行浊泪，半天才道：“你这孩子，真是傻呀！要不要到时候，我托个梦给你？”

在屋外沙沙的雨声中，母亲把一张银行的定期存单，默默地塞到我手里，让我的手攥成一个拳头。她双手抱着我的拳头，使劲地捏了捏。她这辈子积攒下来的钱，都在这儿了。她嘱咐我，这事千万不能叫梨花他们知道。

在母亲的葬礼上，我一滴眼泪都没流。我心里也很苦，可就是哭不出来。我也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常保国他们在告别厅里大呼小叫，哭声震天，可我哭不出来。我心里怀着一个鬼胎，一直在琢磨这样一个问题：要不要将存单的事告诉梨花。我其实并不十分看重母亲留下的那两万七千块钱，而是担心一旦告诉梨花真相，梨花和保国他们会怎么想，我有点吃不准。母亲生病后，一直是由梨花负责照料的。她在临终前夕，忽然把梨花支走，将这张存单交到我的手中，姐姐和姐夫会不会在葬礼上当场翻脸？我吃不准。

玉芬跟我离婚后，我就从上地东里搬了出来，暂时借居在姐姐石景山的一套闲置的公寓房中。房子很新，那是她不久前申请下来的经济适用房。搬进去不久，我就发现，客厅的北墙裂开了一个大口子。夏天倒是挺凉快的，可到了冬天，我用完了三大卷胶带，也没能挡住从裂缝中灌进来的风沙。我和姐姐找到有关部门闹了一次，人家哈哈一笑，说，地面沉降导致的墙面裂缝，是世界级难题，就把我们给打发走了。不过，也许正因为房子裂了口，漏风，姐姐和常保国才会把家搬到椿树街的老房子里。我心里暗暗地想：你还别说，纵贯客厅墙面的这个大口子，裂得还正是时候。

玉芬后来又上门找过我一次。原来，她后来的那个对象，那个主任，在负责调试一台刚从德国进口的数控机床时，由于操作不当，机器出了故障，把电路上的一个元件烧了。这台机床价格不菲，集团领导若要追究下来，他的那个主任多半就当不成了。多半是因为我在给功放加工机壳时，也曾使用过机床一类的器械，玉芬连夜找到了我，让我去帮他看看。

我自然一口拒绝。

你知道的，我对发烧音响一类的器材比较在行，若让我修个家用电脑、空调

或电视什么的，也还算凑手。至于说进口的大型精密数控机床一类的玩意儿，我是见都没见过啊。玉芬见我拒绝她的理由仅仅是胆怯，就对我说了这么一番话：

“嗨，所谓的进口机床，听上去神秘兮兮的，其实也不见得比你平常捣鼓的那些个胆机或电脑复杂到哪里去。再说了，你是天上管机器的星宿下凡，只要它是机器，就都怕你。那玩意，就是欺生。可你一去，情况就不一样了。也许它一听到你的脚步声，自己就吓得赶紧回复了原状，也未可知。”

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些得意。最后，架不住她假意真心的奉承和苦苦哀求，我只得答应跟她去瞧瞧。当然，我也见到了她的那个新任丈夫——那个姓罗的主任。他手里抱着一大摞德文说明书，一步不离地跟在我身后，狗屁倒灶地说个不停。我心里一烦，只好请他滚远点。他竟然一点都没生气，只是嘿嘿地笑。

毕竟是第一次接触这玩意儿，我为了弄清楚这台机器的工作原理，就足足花费了四个多小时。而找出毛病，并加以修复，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玉芬一定是向那个姓罗的隐瞒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在稍后招待我吃饭的时候，罗主任还很客气地问我家住哪里，孩子多大。他还说，如果我孩子将来要去德国念书，可以找他。

玉芬两、三天后又专门来到我石景山的家中。母亲说得一点不错，尽管她跟我离了婚，还算是有情有义。她一脸坏笑地问我，这些日子，身边没个人，是不是憋坏了？她主动提出来，帮我“泻泻火”。对于她的一番好意，我也不便拒绝。我发现她已经怀了孕，心里的那个憋屈，可就别提了。我们在干那事的时候，玉芬还一个劲儿地夸我，说我在女人身上的那些手段，一点都不亚于修机器。她现在的丈夫，是从慕尼黑回国的海归，有点中看不中吃。你这里被他弄得火烧火燎，他那边早已像得了风瘫病似的，龟缩成一个软不滴答的鼻涕虫了。他们结婚四个月来，他连一次高潮都没让她来过。听她这么说，我真不知道自己应当高兴呢，还是伤心。

玉芬瞒着丈夫来看我这样的事，后来还有过一次。但我这样的人，就是命贱。我和玉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姓罗的小白脸，一直不停地在我眼前晃悠。我怎么也摆脱不掉那种隐隐约约的犯罪感。于是，我硬起心肠，对玉芬说：

“我们已经离了婚，既然你嫁给了那个姓罗的，就应该本本分分地跟他过日子，往后千万别来找我了。我受不起。那个姓罗的，看上去斯文有礼，各方面都比我强。至于高潮不高潮的，毕竟不太重要。咱俩一直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再说，你的肚子也一天天大了，总这样，不好。我这儿，你以后就不必来了。”

在我送她去地铁站的路上，玉芬的脸色有些异样。憋了半天，最后搂着我，哭了起来。临走前说了一句话，却让我想了两个多月。她说，她第一次着了别人的道，其实并不是这个姓罗的，而是一个下三滥的机修工。有一天上夜班，那个机修工把她堵在了厕所里，弄得她七荤八素的。

从那以后，玉芬再也没到石景山来。她喜欢的那张《彼尔·金特》组曲，我一次也没再听过。去年五一节前后，我到东大桥给一位客户调试 LP 唱盘，在三里屯附近的街上看见过她一回。在浓密的树荫里，有一排撑着太阳伞的咖啡座。跟她一起喝酒，并把手搭在她光溜溜的肩膀上的，是个黑人。

我没敢跟她打招呼。

奶妈碟

那天，从北五环边的褐石小区出来，我去了一趟平安里电子市场。在那里买了一些拆机的荷兰油浸电容和一卷 WBT 银焊锡，收了一对音乐丝带 Red Dawn 讯号线。这个型号的喇叭线，我已经有了，现在总算凑齐了一套。到了下午，我在返回石景山的途中，顺道去了一趟四季青桥的金源广场，去看望老朋友蒋颂平。

我的客户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一类，就像你所知道的，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大多集中在海淀一带。这些人的优点是彬彬有礼，付钱爽快。他们几乎从不拖欠钱款，在我手头紧的时候，有时也愿意先预付一部分货款。这类人对胆机的要求比较偏重于情调或色彩，也就是所谓的“音乐味”。订货不怎么固定，且人数有逐年减少的趋势。跟这类人打交道，你得学会忍受他们目中无人的夸夸其谈。客观地说，有时候，他们的高谈阔论也会让你茅塞顿开，可有时就会让你受不了。每个人的脸上，似乎都有一种既神圣又轻佻的劲儿。仿佛整个世界的命运，都被紧紧地掌握在他们手中。按照我粗略的观察，他们的观点其实也很不一致。

比如说，有一伙教授，每次见面都爱严肃地告诫我，像中国这样的社会，随时都会有崩溃的危险。其实我从未主动请教过他们，可他们乐于在饭桌上见缝插针地点拨我一番。弄得我时常做噩梦。差不多一二十年前，他们已经在这么说了。一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太阳还好端端地在天上挂着呢！中国还是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另外一伙人呢，意见刚好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全世界的人都眼巴巴地看着中国。全世界都出了问题，都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中国人去搭救。咱手里捏着数万亿美元的花花票子，简直不知道应该先去救谁，是冰岛、希腊呢，还是意大利和美国？事实到底如何，我不清楚。这是人家政治家和读书人的事。反正，我很快就被他们弄糊涂了。

我的另一类客户，不用说，自然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老板们了。乍一看，那些腰缠万贯、灵魂空虚的家伙，似乎怎么也无法和纯正的古典音乐沾上边儿。他们能够成为我相当稳定的客源，主要得益于蒋颂平的推荐和介绍。颂平把引诱苦主们上钩称为“钓鱼”。他的办法一成不变。

通常，在家庭聚会或私人茶叙的末尾，蒋颂平照例要强迫那些生意伙伴和合伙人什么的，去参观他的地下室。那是一个接近 60 平方米的视听室。他所使用的那套音响组合，做工精致，外观花哨：音箱是意大利 Sonus Faber 的 Amati Anniversario，箱体那华丽的小提琴漆光可鉴人；功放用的是麦景图 50 周年的纪念版，开机时，面板上泛着蓝绿蓝绿的微光；Nagra CD 机犹如瑞士手表般的精美，外加一款 Clearaudio 的顶级 LP 唱盘。从声音的效果来看，那还算得上是一套注重细节和解析力的重放系统。

每当这个时候（一般是晚上十点钟以后，颂平很少在晚上十点前听音乐，因为据他说，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稳定的电压和纯净的电流才会带来醇美的音乐），颂平总要将食指竖在双唇之间，发出轻轻的“嘘”声，然后打开墙面上淡蓝色背景灯——墙面做过特殊的隔音处理，看上去像倒扣的鸡蛋托一般凹凸不平，拉上厚厚的绒布窗帘，戴上雪白的软布手套，蹑手蹑脚地跨过满地堆放的器材和引线，从茶几上那一大堆 CD 唱片中翻找出一张俗称“奶妈碟”的发烧盘来，“嗤嗤”地朝碟面上喷洒不明液体，然后用镜头布将 CD 擦干。仿佛他不是让大家欣赏音乐，而是正在进行某种神秘的祭祀活动。

虽说北京的灰土有点大，但我还是多次建议他不要用清洗剂来擦拭光盘，因

为那些化学液体或许会腐蚀这些塑料片，从而影响 CD 机光头的循迹。实际上，最理想的清洁剂莫过于清水。但颂平从来不听。他的理由总是显得那么不可理喻：

“开玩笑！这不是什么普通的清洗剂。它是英国进口的，你知道吗？这么小小的一瓶，他妈的值多少镑？你丫的猜猜看！用清水？开玩笑！”

当然，我只得立刻闭嘴。

当“奶妈碟”的乐声从幽暗的房间里像绸布般展开的时候，那些酒足饭饱、脑满肠肥的生意人，往沙发上这么一靠，一些人很快就会发出鼾声。但不要紧，总有那么几个家伙会上钩。他们抵抗不住“奶妈碟”的魅力，脸上浮现出惊讶之色，就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眼睛里放着绿光，拼命点头，似乎他们在欣赏的正是天籁之音。

通常还等不到一个乐章结束，就会有人激动地站起身来，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蒋颂平嚷嚷道：

“怪不得颂平迷上音乐，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摸了。有道理啊！老蒋，给我也来这么一套，一模一样的。要快！”

他们这一嚷，就够我忙活好几个月了的。一年中，要是能遇上五、六个这样的“苦主”，我那半死不活的日子就能勉强维持下去了。我从二手交易市场上或 ebay 上替他们找箱子、CD 机和线材，然后将我自己做的胆机，悄悄搭进去卖给他们。我只收胆机的钱。我为他们配置的系统，不可能和蒋颂平一模一样。但你知道，那张让客户们念念不忘的“奶妈碟”，自然是必不可少。

说到“奶妈碟”，我这里不妨再啰嗦几句。

这是一张 DECCA 公司于 1962 年出版的著名唱片，1993 年将它灌制成了 CD。作曲家是个法国人，名叫霍尔德，出生于 18 世纪末。这个作品原先是一出歌剧，讲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性向往自由的故事。标题翻成中文，似乎叫做《女大不中留》。这部歌剧，后来被一个名叫兰切贝利的人改编成管弦乐，并由他亲自担任指挥，英国柯文特皇家花园乐队演奏。至于霍尔德本人，也许根本算不上什么像样的音乐家。你翻遍所有的音乐辞典，似乎也很难找到他的名字。但这张唱片，对于很多刚开始听古典音乐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剂迷药。它的音色、空间感和弦乐的密度感，有一种刚柔相济的美。事实上，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曲子，但也不得不承认，它的演录水平无与伦比。就算你从来没听过任何一首古典音乐，只要你把这张碟耐心地听上五六分钟，你就很难抵挡它的诱惑。你会以为自己疯狂地喜欢上了“古典音乐”。这当然是一种错觉。正是因为它把很多不相干的人领进了古典音乐发烧的门槛，并哺育他们成长，故而它又有“奶妈”之称。

我所结识的发烧友，几乎人手一张。而在茶余饭后，强迫朋友们到地下室欣赏“奶妈碟”，也成了蒋颂平的保留节目。他之所以这么做，也不完全是出于替我“钓鱼”的考虑。他本人在读大学时拉过小提琴，喜欢海菲兹和柯岗，他总爱向他的朋友们炫耀一下自己与众不同的生活品味。

颂平不仅交友广泛，宾客众多，妻子那一头，亲朋故旧，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也喜欢往他们家扎堆儿。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家从来就没有过安静的时候。就像俗话说的，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似乎不来上十七八个客人，他们家就开不了饭。任何时候，他们家都像是过节般乱哄哄的。

今天的状况当然也不会例外。

午餐后的客厅，已恢复了原先的整洁，可房子里仍弥漫着白酒、花椒油和四川腊肠的味道。几个女人围坐在沙发前，听一个八九岁女孩拉小提琴。我一个都

不认识。餐桌边坐着两个神态麻木、虚弱不堪的老太太，她们已经老到只会喘气的地步了。其中一个为蒋颂平的姑妈，另一个则是岳母。她们不说话，静默中偶尔朝这边呆望一两眼。

小女孩在拉了一段拉赫玛尼诺夫的《无词歌》之后，在众人的怂恿之下，又拉了一首《新疆之春》。应当说，她拉得实在是很难听。我无法长时间装出饶有兴趣的样子，就直接去了地下室。

颂平也不在那儿。

黑暗中，我隐约看见几个人，正戴着 3D 眼镜，聚在那里看《加勒比海盗》。保姆往那儿送果盘，顺便告诉我，颂平在楼上的书房里。

可颂平并不是一个人在那儿。在书桌的另一侧，坐着一个身穿咖啡色中式对襟衫的中年人。由于不胜酒力，他那张青筋暴突的脸一直红到脖子里。颂平向我介绍说，这位姓杭的大师，是一位道行很深的堪舆家。颂平打算在大兴新建一个服装厂，请这位“异人”来帮他看看风水。据说，这位神通广大的高人不光会看风水，还会替人算命。颂平执意让他给我算一卦，我也不好推辞。杭大师猛然睁开了惺忪的醉眼，使劲地摇晃了一下头，把自己从醉梦中拽了回来，笑呵呵地问我算什么。随后，他又愣愣地看了一眼颂平，嘴里嗫嚅道：

“不好。要吐。”

“你就替他算算婚姻吧。”颂平道，“我的这位兄弟，也没啥别的嗜好，就是老惦记着结婚。”

杭大师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三枚铜钱来，那是被磨得油光锃亮的“康熙通宝”。他把铜钱递到我手上，让我打卦。按照他的吩咐，我在地毯上一连抛了六次。大师干呕了几下，跟颂平要来了纸和笔，随便在纸上画了画，眼睛朝上翻了翻，就对我宣布说：

“结过了。”

随后，他就闭上金口，陷入了莫测高深的沉默之中。这命，似乎已经算完了。我低声下气地请教他，让他解释一下，所谓的“结过了”，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大师没有搭理我，而是用一种充满疑惑的神情，怔怔地看着颂平：

“不好。真的要吐。”

他扶着桌子，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接连放了几个特别婉转的屁。颂平面露嫌恶之色，大概是担心大师的呕吐，弄脏了他的房间，什么话都没说，由他捂着嘴，匆匆跑下楼去了。

“他刚才说，结过了，我有点听不明白。”大师走后，我对颂平道。

“没戏。”颂平道，“听他的意思，大概是说，你这辈子就甭想结婚了。正好，你也不用惦记着那狗娘养的小朱了……”

话没说完，我们都听见了楼下花园里传来的呕吐声。大师吐得摧肠沥肝，连颂平都皱起了眉头。

颂平说的那个“小朱”，原是他们公司里的一位出纳，名叫朱蕊蕊。我和玉芬离婚后，颂平一直在帮我张罗着再找个人成家。但他给我介绍的对象，不是职工食堂的胖丫头，就是笨手笨脚、专管打扫卫生的清洁工，没有一个让我能够稍稍看得上眼的。颂平把给我介绍对象看成是他份内的事。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平常知根知底。除了他之外，我还真的想不起来，还有谁可以称为“朋友”的。颂平总怪我挑三拣四，我只得严肃地提醒他，我虽然穷，却也并非饥不择食。我倒是对他们公司的出纳小朱情有独钟，她笑起来傻呵呵的，眉眼有点像玉芬。有一次喝多了酒，我便委婉地向颂平表露了这个意思。老蒋似乎吓了一跳，他未置

可否地干笑了两声，对我道：“你怎么会偏偏看中她？”

我告诉他，家母病重之际，曾跟我交代说，人人都会有一个老婆。她就躲在这个世界的某处，缘分一到，她就会立即现身。你一旦瞧见她，心里马上就会明白，这人就是自己天造地设的婆娘。不消说，我第一次看见朱蕊蕊的时候，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颂平愣了半晌，正色地对我道：

“不行。我厂里的人，你随便挑，什么人都行，唯独她不行。”

后来，这个朱蕊蕊，很快就被颂平送到了渥太华，办了移民。还和他生了一个儿子。你可以想见，为什么我每次见到蒋颂平，心里都像是做贼似的。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每次在我面前提到这个朱蕊蕊，都称她为“你嫂子”。为此，我曾一度发誓不再跟蒋颂平来往。可苍天有眼，这个朱蕊蕊到了加拿大，还不到两年，就被一个打架子鼓的洋人勾跑了。办离婚的时候，颂平连儿子的抚养权都没争到。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朱蕊蕊，就像是在谈论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

大师呕吐完了以后，也没再到楼上来。颂平从木盒里取出一支雪茄，一边用喷枪烧着，一边轻轻地甩动着它，然后对我说：

“我要跟你说件正经事。我最近刚认识了一位朋友。他是做什么的，什么来头，我一概不知。是真的不知道，不骗你。可你一见这个人，总觉得他有点，怎么说，有点他妈的神秘兮兮。我也不知道那种感觉是从哪儿来的。按说，他那长相，也没啥特别的，可脸上那神情，看上去有些他娘的瘆人。不瞒哥儿们说，在有钱人的俱乐部里，我不过是一个小角色，这你是知道的。我问了很多人，也没弄清他是个什么来路。他的名字也很怪，叫做丁采臣。对了，你看过一部叫作《倩女幽魂》的电影吗？好，咱们先不说这事儿。这个人，这个姓丁的，前些日子，托人介绍找到了我，让我务必帮他弄一套全世界最高档的音响，越快越好。钱当然不是问题。这是个好买卖，对不对，OK，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

“他是发烧友吗？”

“看来不太像。”颂平的神色忽然变得有几分异样，似乎一提到这个人，目光就有点畏惧。“这是一条大鱼没错儿，可你也得小心一点。你可以趁机敲他一笔，但我希望，你不要做得太离谱。这年头，凡事总要留个余地为好。凭我的直觉，这个人有点邪行。”

“有没有预付款？”

“这个呢，你自己跟他联系。这是他的名片。你可以给他一个卡号，让他先把预付款打过来。你和这种人打交道，千万得多留几个心眼啊。他看你的目光，不知怎么搞的，冰冷冰冷的，有点像是魂不附体，属于那种你一见到他，背脊就不由得一阵阵发凉的人。”

按颂平的说法，这个名叫丁采臣的人，只和他见过一次面，给他留下的印象竟然如此令人胆寒，连你听上去，也多少有点不可思议吧？虽说我对这个未来的客户也多少有点好奇心，可说真的，也没怎么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我饿着肚子来到颂平的住处，也有自己的隐衷。

姐姐崔梨花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她让我无论如何，得尽快从她家的房子里搬走。而我在刚才的电话中，已经答应她了。在我被姐姐逼得没办法的时候，脑子里猛然就闪现出蒋颂平那张虚胖的脸来，好像这张脸让我心里有了底。我心一横，就答应了她。想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混了四十八年，眼见得终于混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心里就有点控制不住的凄凉和厌倦。

我问颂平，能不能请他在服装厂里随便腾个地方出来，让我暂时落个脚。车间、仓库什么的，都行。颂平吃惊地看了我一眼，从桌上拿起那只正在充电的手机，一条条查看短信，嘴角一撇，掠过一丝不太自然的笑容：

“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你老兄，在石景山住得好好的，怎么忽然就想到要搬家？”

“房子是我姐姐的。她们的境况也不太好。打算把房子租出去。”

“那个破房子，我记得，北墙裂了那么大的一个口子，呼呼地往里灌风，怎么能租得出去？”

“姐姐和姐夫打算搬回到石景山来住，想把椿树街的那套带小院的老房子租出去。一个证券公司的高管不久前找到了他们，打算租下那个小院，开一个酒吧。”

“伯母现在身体还好吗？”颂平忽然问。

“五年，不，六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我也吃惊地看了颂平一眼。

“唉，这话你跟我说过多次了。你看我这脑子，近来总爱忘事。这记性说不行，就不行了。伯母去世的那会儿，我正好在加拿大，没赶上她的葬礼，因此总觉得她还活着。小时候，在椿树街住着的那会儿，我嘴馋，没少吃她老人家做的粢饭糕，又松又脆。你们家的房子临街，还带个小院，对不对？那种地方，要是开酒吧，生意一定不会差。”

过了一会儿，颂平轻轻地叹了口气，又道：“我这里也没有多余的空房子。这两年，服装厂的生意，你是知道的。我们的衬衫，贴牌销往国外，说到底，也就挣点手工费。可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经济都不景气，货物积压很严重。再说了，如今的工人，胃口越来越大，工资和福利一涨再涨，也有点让我吃不消了。”

“我不会住很长时间。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等我找到了合适的房子，就搬出去。”

颂平没再接话，而是把目光转向了朝西的窗户：“这两天降了温，西山一带的枫叶虽还没红透，也有点意思了。早上一睁眼，朝窗外乍一看，冷不丁地还以为自己是在加拿大呢。”

“他们让我最好月底前就搬出去。姐姐还好商量，关键是我那姐夫常保国。他是湖北人，脾气有点暴躁，要是发起牛脾气来，能把痰直接吐到你的领子里。他是开出租车的，去年在昌平翻车撞死了人，自己也瘸了一条腿。”

“湖北人，是有点难缠。九头鸟嘛。”颂平递给我一小杯茶，笑道：“昨天有人给我送了点滇红来，你尝尝。近来金骏眉炒得很厉害，有点离谱。可要我说，还是滇红的味道正一些。”

“那个常保国，倒也不常来找我的麻烦，可他成天拿我的姐姐撒气。我有点不好意思再赖在他们家了。今天早上，他还用大头皮鞋直接踹她的，她的下腹部，害得她尿血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颂平阴沉着脸，再次皱了皱眉：“我去一下卫生间。”

等到他从隔壁卧室的卫生间出来，身上已经换了一套运动服。他把手里提着一个纸袋塞到我手里，告诉我，他要去香山的一个会所打网球。然后，又像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似的，对我说：

“那个姓丁的，你一定记得给他打电话。你怎么和他做生意，这我不管，但有一点，该说的话你可以说，不该问的，一句也不要多问。”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起身告辞。如果你在那一刻见到我，一定能觉察到我脸上的狼狈和羞惭。可我刚转过身去，颂平又把我叫住了。

他让我再等一下。

他靠在书桌前，手里转动着那支早已熄灭的雪茄，似笑非笑地望着我，神情忽然变得有点险谲。

“我要提醒你一件事。说起来有点诡异啊，不过，你最好别往心里去。”颂平轻声道。

“有什么事你就说，别这么装神弄鬼的好不好？”我有点心烦意乱。说实话，刚才，蒋颂平故意不接我的话茬，让我多少有些意外。

“别把你姐姐的什么最后通牒放在心上。她也不过就是那么一说。”

“你到底想说什么？”

“很明显，你姐姐在撒谎。”

“我不太明白……”

“你刚才说，今天早上，你姐夫常保国用大头皮鞋踢她的小腹，是不是？你想想，这年头哪来的什么大头皮鞋？你是卖过鞋的，应该比我清楚。再说，既然你姐夫去年在昌平的车祸中瘸了一条腿，不管他用哪只脚做支撑，”蒋颂平用手比划了一下自己裤裆的位置，接着道，“他都不可能踢这么高。要么你姐姐在撒谎，要么……”

蒋颂平说到这儿，朝我莞尔一笑，看上去就像一个表情轻浮的业余侦探。坦率地说，他脸上那洋洋自得的神情，让我有点反感。我当然知道他话里潜藏的意思。

他大概是怀疑我在撒谎吧。

到了车上，天空忽然飘起了小雨。我打开那个纸袋，看了看，里面有两件新衬衫，是 TOMMY 牌的。颂平送我衬衫，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不知怎么，这一次，看着那两件斜纹条的衬衫，我心里忽然就有些难过。

六個字母的解法（選章）

劉禾

納博科夫的小說《洛麗塔》大約無人不曉，研究著作更是林林總總，也算文學研究中的一道風景。不過，我最初對這位作家發生興趣，倒不是因為他的作品，而是出於好奇，這個人為什麼一輩子租房子住？

納博科夫一生搬過無數次家，每次都是租房子住。二戰期間，他從歐洲遠渡美國，幾年輾轉，最后在紐約州的康奈爾大學定居下來——這也是胡適早年留學的地方。納博科夫在那裡教了十幾年書，他從不買房，只租房。大學有上千名教授，總有人休長假，有人出租房屋，因此，納博科夫一家三口，不愁租不到地方住。他的這種做法，在精於盤算的美國人眼裡，自然是極不明智的。後來，小說《洛麗塔》一炮打響，成為暢銷書，版稅收入源源不斷，納博科夫從此衣食無憂，但他依舊不買房，依舊租房住。到了晚年，他搬回歐洲，索性和妻子住進一家瑞士小城的賓館，租了一套客房，一住就是十幾年，直到他離開人世。

一個作家一輩子租別人的房子住，實在少見，尤其放在歐美作家的行列里，就更顯突出。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納博科夫為什麼這樣做？是不是有什么特別的原因？是不是早年有過什麼創傷，造成了不為人所知的心理障礙？

工作之餘，我開始零星地蒐集有關納博科夫的各種資料，想從他的人生蹤跡中找出某種心理邏輯，因為在我看來，任何古怪的行為後面都隱藏著一個真實的理由。但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手中的資料彙集得愈多，我的研究就愈變得撲簌迷離，枝杈叢生，而且愈偏离主題，到後來，竟然放棄了原先的想法，沿著另一條路越走越遠。

仔細回想，最初使我偏離主題的導因，可能還是一封不期而至的電子郵件。

1

一天傍晚，我收到了一封電郵，一封來自瑞士的巴塞爾大學的普通會議邀請信。這些年來，我對於參加這一類的學術會議，變得興趣日淡，經常找些藉口，推辭了事。可是這一回我實在難於推辭，會議地點太吸引人了，英特拉肯——它是瑞士阿爾卑斯山腳下的一座小城，歐洲的滑雪勝地。從這裡乘小火車，坐纜車，就能登上那座享有歐洲巔峰之盛譽的少女峰，上面有長達二十三公里多的阿萊齊冰川，据说它是阿爾卑斯山上最大的冰川。

從紐約飛到歐洲共要六個多小時，抵達日內瓦國際機場後，再乘兩個半小時的火車，才能到達瑞士小城英特拉肯。臨行之前，我順手從書架上抓了一本書，塞進旅行袋中，預備在路上打發時間。這是納博科夫的小說 *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ht*，中文譯名是《塞·納特的真實生活》，我自己寧願把它譯為《塞·納特的人生真相》。書名平淡無奇，但它屬於讓我著迷的那一類作品，也是納博科夫用英文撰寫的第一部小說。比後來在商業上聲名大噪的《洛麗塔》，這部《塞·納特的人生真相》讀起來更加耐人尋味，技巧上也許更勝一籌。不過，我為什麼特別喜愛這本書，這裡面是不是有更隱秘的因素，在當時，我自己也不甚了然。

人的命運有時很詭異。有的人足不出戶，就無所不通，實際上一輩子只生活在自己熟悉的小天地裡。比如哲學家康德，他從未離開過自己出生和成長的城市

哥尼斯堡，可是竟然在大學裡長期講授人類學，這在後來的人類學家看來，即使不算犯規犯忌，也不大靠譜——不做田野調查的人類學，那算什麼人類學？好在康德講授人類學和撰寫人類學著作這件事，差不多早已被人忘記，也很少有人追究。另一種人恰好相反，他們浪迹天下，一生漂泊，始終找不到歸宿，最後客死他鄉。他們都是一些失去家園的流亡者。

生於孰地，來自何方？這樣的人在二十世紀頗多，以後會越來越多。

其實，這種流亡者在世界各地都能碰到，我周圍的朋友和同事中就有很多這樣的人。我不是指通常意義的流亡人士或持不同政見者，而是一些靈魂深處不安份的人，他們不切實際、耽於幻想，似乎只能在幻想之中安身立命，否則，這種人為什麼與文學或思想多少有些緣分？納博科夫的《塞·納特的人生真相》就寫了這樣的一個流亡者，不過，這本書的不尋常之處在於，主人公塞·納特的下場預示了作者自己後來的命運，因為小說發表四十年後，納博科夫本人也客死他鄉，選擇的地方就是我提到的瑞士賓館。

火車上的廣播說，英特拉肯站馬上就到了，我趕忙從窗外望去，殘冬的英特拉肯徐徐滑入車窗的視野。第一眼看上去，這個小城就像歐洲的任何一處旅遊勝地一樣，美麗而不真實。我把眼鏡摘下來，呵了口氣，仔細擦拭鏡片，抬頭再看時，重重疊疊的阿爾卑斯山脈已經赫然矗立在眼前，幾座高峰在霧中小城的背後平地拔起，高聳入雲，巍巍峨峨。火車停靠英特拉肯東站的時候，天色變得陰沉起來，旋即飄起了雪花，雪花裡摻和著一些細小的冰粒，大約就是古人所說的雪霰。我因出發時沒有帶傘，下車後，凌空飛舞的冰粒砸在臉上，有點隱隱作痛，幸好打聽到，賓館的位置離車站不遠。

走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兩旁的店舖緊閉著大門，這光景似乎不像一個度假勝地，我感到有些意外。沿途看到兩三家餐館，似乎還在營業中，其中有一家中餐館外賣店，生意蕭條，毫無人氣。不論走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哪怕是天涯海角，必然會碰到這種千篇一律的、裝潢俗氣的廉價中餐外賣店，我開始還有些奇怪，現在已經見怪不怪了。

雪越下越急，幾乎叫人睜不開眼，抬頭一看，雲層又加厚了，偶爾露出狹窄的縫隙，讓人瞥見藏在後面黑壓壓的山峰。幾乎在一秒鐘的瞬間裡，山峰像魔術般地閃現出來，即刻又融化在雲霧背後，教人看不清這雲霧後面的真實情形。我心底忽然升起了悵惘的情緒，說不清是為了什麼，這時，一個遙遠的聲音在耳邊響起：

谁在那边踏雪，终生不曾归来？¹

2

第二天早晨起晚了，趕到餐廳時，發現只剩下一個孤零零吃早飯的人。這是一位中年的美國學者，個頭不高，但衣著極為考究，用英文來說是 well groomed。他和我同樣由於時差的原因，都起晚了。我們彼此問候了幾句，他匆匆看著腕上的表說，會議馬上開始了，說完就起身告辭。剛走出幾步，好像忘記了什麼，他轉過身問我，你對英特拉肯這個地方的印象如何，我說，還不錯吧，你也是第一次來？他說是，然後指著自己的襯衣說：瑞士人只認名牌和高檔商品，別的什麼都不懂，瞧，我的名牌袖扣就是專門戴給他們瞧的。聽他這麼講，我才注意到他

¹ 歐陽江河《初雪》。

身上穿的那件淺藍色的襯衣，是很好的質地，袖口上別著一對晶瑩透亮的裝飾扣，這扣子到底是什麼名牌？不待我弄明白，這人已消失在我的視野之外。

走進明亮寬敞的會議廳時，上午第一場的發言已接近尾聲。一位來自德國法蘭克福的歷史學家正在發言，我仔細一聽，才知道他在描述 1919 年歐美列國迫使德國簽署《凡爾賽條約》的場景，這位世界大戰的專家認為，《凡爾賽條約》造成了德國人喪權辱國，激怒了德國的普通大眾，於是希特勒乘虛而入，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悲劇。

報告人的話音剛落，一場激烈的爭論就開始了。我剛才在飯廳碰到的那位美國學者，馬上質疑報告人的歐洲中心論，他一邊說，一邊情緒激昂地打著手勢，我看見他衣袖上的袖扣熠熠閃亮。

1919 年，一個充滿變數的年份：難民、條約、巴黎和會、經濟制裁、家國……但是，對個人來說，對一個普通人的命運來說，1919 年究竟意味什麼呢？

我變得有些心不在焉，會場上的發言依然在繼續，漸漸地，嘈雜的人聲退到了很遠的地方，我的意識開始渙散起來，不知不覺地聯想到納博科夫。

1919 年，我努力地回想，這一年，納博科夫，他在哪裡？翻開筆記本的最後幾頁，那上面有我曾經隨手記下來的幾個名字，不過沒寫日期。我在這幾個名字之間曾經勾勒出幾條虛線，其中一條線把納博科夫和一個被他化名稱爲“奈思畢特”的劍橋大學的同學連接起來。我在蒐集有關納博科夫的材料期間，這個“奈思畢特”一直讓我很好奇。他是誰？我掌握的相關信息很少。納博科夫在自傳裡提到過一個細節，他說奈思畢特在講話的時候，總是煙斗不離手，這個人叩煙斗、放煙絲、點火和抽煙的姿勢有點與眾不同，不知爲什麼，那一連串重複性的動作給納博科夫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

這個奈思畢特是英國人，他酷愛文學，並毫不諱言他對列寧和十月革命的擁護，他的政治立場是納博科夫所不能接受的，兩個朋友因此而經常爭吵，有時爭得面紅耳赤。納博科夫畢竟是在俄國革命爆發後，才流亡到英國的俄國貴族後裔，並且他歷來對政治很反感，只有當話題轉移到兩人共同熱愛的詩人和作家時，他們才言歸於好。

這條線索是我在納博科夫的自傳裡讀到的，它是我當時所能找到的惟一的線索。

出於某種原因，納博科夫不願透露此人的真實姓名，據說他在發表這部自傳的時候，那位當年的大學同學已成為令人矚目的公眾人物，他的名字在英國幾乎家喻戶曉。這讓我更加好奇，奈思畢特這個化名背後究竟隱藏了一個什麼人物？我在筆記本裡，把 N E S B I T 的幾個字母用大寫拼出，來回變換字母的排列順序，企圖從中發現隱藏在這六個字母背後的密碼，但始終毫無所獲。直覺告訴我，這條線索很重要，如果運氣好，它可能解開我心中的一個謎團。

歷史上有太多難解的謎團，多重的偶然性和時間脈絡意外地交叉在一起，迷霧重重，幽深難測。最近聽說，有人研究氣候變化與人類戰爭的關係，拿出了大量的數據，聲稱戰爭爆發的時間和持續的時間，竟與氣候變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然而，這之間真的是一種因果關係？還是有更複雜的因緣在起作用？我一直認為，因果關係是我們人為地建立起來的分析模式，而偶然性和時間脈絡的意外交叉則不同，它更像氣候，更像地球的生態，那裡面的因緣脈絡無比龐大和複雜，如同科學家所說的蝴蝶效應，這一類的複雜系統究竟如何運行運作，那是我們凡人難以把握的。

說實在的，一個人想要撇開現成的歷史書，另闢蹊徑，尋找通往時間深處的陰暗小徑，談何容易。在我接觸到的二十世紀的歷史敘事中，1919年，1948年，1968年，1989年這幾個年份，尤其撲簌迷離，好像是一團團理不清的亂麻，無論你往前梳理，還是往後梳理，都無法清晰起來。這不能不令人懷疑歷史學家的因果邏輯和敘述技術，反倒是，詩人的想像更能喚起我們的靈感：

多麼漫長，這個春天
一直徘徊到冬天的盡頭
時間丟失了它的鞋子
一年猶如四百年²

為了弄清一戰和1919年以後的變遷，我曾多次鑽進圖書館和檔案館，翻閱從前的圖片、電報、文獻，還有報紙刊物。在圖書館裡，布滿灰塵的紙張永遠散發一股發霉的氣味，我一邊嗅著這熟悉的氣味，一邊埋頭翻找所有可能找到的線索；有時看累了，就閉上眼睛，任憑時光流轉，幻覺中，好像這故紙堆的氣味已經轉化為歷史本身，使我幾乎觸摸到1919年的脈搏。可是一睜眼，我又陷入深深的沮喪，在此之前，世界上發生了那麼多的事，活過那麼多的人，而在我的身後呢？一百年以後呢？……這一類的胡思亂想常常干擾我的思緒，加之幾次尋找的線索，都化作捕風捉影的努力，我不止一次想到放棄。

3

在瑞士英特拉肯的最後一夜，風暴戛然而止。早晨起來時，雲霧已不見蹤影，我們得到消息說，通往少女峰的小火車開放了。這天下午，久違的藍天顯得格外透明，藍天襯托著白皚皚的雪山，我想像中的阿爾卑斯山竟然化為現實。和會上認識的幾位學者結伴出行，我們登上了小火車，沿著蜿蜒起伏的山區鐵道緩慢爬行。列車像一隻掛在在險峰和山壑之間的玩具火車，驚險無比地蠕蠕而行，一眼望下去，身邊就是萬丈深谷，難怪這條鐵路在暴風雪期間必須關閉。火車在海拔三千四百五十米處，駛入一個山區小站，這大約就是歐洲最高的火車站。

站台上的人群川流不息，許多是肩扛滑雪板的青少年。我們看到遠處有人在排隊乘纜車，也趕過去排隊，不久便登上了擁擠的纜車。這裡是滑雪族的天下，全副裝備的年輕人抱著滑雪板和遊客擠在一起，滑雪板幾乎遮住了每個人的視線，我努力往後車窗移動，想找到一個合適的角度朝外面看。纜車緩緩移動，隔窗遠眺，只見一峰獨立，眾峰俯首，幾朵白雲奔騰腳下。再定睛凝視，五隻滑翔傘倏然從纜車的左方衝出，遊戲般地繞過我們，在雲霧中玩起天女散花的遊戲——紅、藍、黃、綠、紫，五種色彩點綴起白雪皚皚的山脈，好一個阿爾卑斯山的氣象！

不到少女峰，安知萬象空？

4

黃昏時分，我拖著行李箱，登上了返回日內瓦的火車。白天的興奮消耗了我的大部分精力，我忽然感到極度的疲乏。火車走得很慢，停靠了幾個小站後，我昏昏欲睡，不知自己身在何處。過了很長的時間，火車似乎又在一個小站停下，聽不清站名，我喝了一口水，努力使自己清醒過來，從桌上拿起《塞·納特的人生真相》，再接著讀下去。

² 聶魯達的《狂想集》。

我上車後，二等車的這排沙發椅只坐了我一人，對面的座位一直空著。這時，上來一個矮個的，看起來約六十七八歲的男人，他朝我點了一點頭，把手提包放在頭頂的架子上，就在對面坐了下來。火車繼續前行，窗外遠近的燈光一閃而過，在空中繪出上下飛舞的直線和圓弧。我正望著窗外舞動的線條發呆，忽然發覺玻璃窗上映出一雙明亮的眼睛，正在注視我。轉頭一看，對面的陌生人在朝我微笑，他的兩條粗重的眉毛跳動了幾下。

天氣真不錯。You…Japanese? 他帶著法語腔問。

No……當然不是。我不願意和陌生人搭話，歐洲人經常弄錯，把中國人當成日本人，讓人心裡不快。

陌生人摘掉手上的羊皮手套，指著桌上的書說，你懂英文？我點點頭，和他簡單應酬幾句，目光又轉向窗外。我此時並無心情和人聊天，陌生人也順著我的眼睛向窗外看去。這時，火車駛入了日內瓦湖區，月光下的湖水銀波蕩漾，遠方的阿爾卑斯山脈影影綽綽。

戰後我第一次去英國，陌生人說。他停了一下，兩條粗重的眉毛跳動了一下，眉毛是灰白色的，我注意到，他那兩隻誇張的耳朵，微微地抖動了一下。

陌生人扳著手指頭說，我去的是倫敦，曼徹斯特，劍橋，愛丁堡…他看了一眼沒有數到的大拇指，然後朝我跟前湊近一點。

你去日內瓦？

我點點頭，我是第一次來瑞士。

讓我來猜猜，像你這樣的亞洲女子，獨自在歐洲旅行，是來度假，還是來找人？他的腦袋向右邊一側，兩條濃眉下面的眼睛專注地看著我，兩隻耳朵微微顫動了幾下。

我不想回答，可嘴裡卻說：找人。難道他要繼續盤問下去嗎？

陌生人張了一下嘴，點點頭，若有所思的樣子。他拿起放在身邊的羊皮手套仔細戴上，又輕快地把它脫下來。

我叫奈思畢特，說著他伸出右手，和我握了握手。

又一個奈思畢特，有意思，這人難道是從納博科夫的小說裡走出來的？

我也把自己的姓名告訴了他。

原來你是中國人。陌生人忽然來了興致，他接著剛才的話頭繼續說：二戰後我先是到了倫敦，然後又搬到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剛成立的時候，我在秘書處幹了兩年半，認識幾個中國人。我那時很年輕啊，現在不行了，已經退休十多年。記得當時一個很有學問的中國人在某一個部門主事，他叫什麼名字？讓我想想，游一黨一林……

是林語堂嗎？我好奇地問。

對，對，是他……啊……對不起……他從衣兜裡掏出一疊紙巾，抽出一張，開始大聲地擤鼻涕，擤了一會，又抽出一張紙巾，仔細地擦了擦自己發紅的鼻頭，然後把用過的紙巾仔細卷起來放進褲兜，接著又說：我記起來了，新成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處還有一位可愛的中國女人，英語講得漂亮，還會說法語，她人很聰明，見過大世面，好像是搞科學出身的，名字我還記得，叫桂一簡一路。

桂一簡一路，魯一桂一簡？她是誰？好像沒聽過這個名字。奈思畢特先生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他說，等一等，然後站起身，從行李架上把公文包拿下來，打開側面的拉鎖，掏出一個很舊的筆記本，嘩嘩地翻幾下，從裡面撕下一頁空白紙。我把一隻圓珠筆遞給他。奈思畢特先生抬頭看了我一眼，在紙上把他剛才所說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寫下來，遞给了我。我接過來一看，Gwei-Djen Lu，這是很

少見的漢字注音，既不是老派的韋氏拼音，也不是當年傳教士使用的注音符號，比如像用 Peking 來書寫“北京”的發音。我搖搖頭說，沒見過這個名字。

窗外的燈火飛馳而過，猶如月光下閃光的河流。我意識到火車開始減速，透過鐵道附近樓房的黑影，隱約看見街道上一晃而過的紅綠燈，公路橋下開始出現川流不息的車流。這時，列車上的廣播響了：前方到站是洛桑車站。

火車駛進車站時，車廂裡立即熱鬧起來。那些身背行李肩扛滑雪板的年輕人，大呼小叫、成排結對地往外走，奈思畢特先生碰巧也在這一站下車。他站起身來，將公文包從行李架上取下，不慌不忙地說：認識你很高興，後會有期。我與他握手道別，也說了幾句同樣的話，奈思畢特先生走到車門口，略停了一下，轉過身對我說：

聽說 Gwei-Djen Lu 女士後來去了劍橋大學。

看著奈思畢特先生的背影消逝在站台的夜幕之中，我把那張寫著 Gwei-Djen Lu 的紙片夾在書頁裡，腦筋飛快地轉動起來，這位陌生人讓我想到納博科夫筆下的那個煙斗不離手的同學奈思畢特，怎麼會這麼巧，名字聽起來一模一樣？納博科夫傳記裡的奈思畢特是個杜撰的化名，實際並無此人，這是我知道的。那麼，剛才與我邂逅的陌生人……他們的名字是純粹的巧合，還是有不同的拼寫？

車輪有節奏地向前行駛，窗外的景物越來越暗淡，我的思緒也隨之渙散起來。這時，Nesbit 和 Gwei-Djen Lu 這兩個名字的 16 個字母，慢慢地升到空中，在我的眼前旋轉起來，如同動畫片裡的單個字母，歪歪斜斜地分散開來，過一會兒，它們又慢慢地聚合在一起，組成奇奇怪怪的詞組，不下於幾十種不同的字形，可我連一個都認不出來，就像在讀徐冰的《天書》。驀地，有一個詞組從一堆飛舞的字母中跳了出來，那形狀似曾相識，但又看著陌生，這使我焦急萬分。我努力克服無意識的惰性，正打算看得清楚一點時，這個神秘的詞組已在空中化為烏有……

5

我從日內瓦飛回紐約的途中，心中忽然懊喪起來。頭天晚上，火車停靠洛桑車站的時候，我怎麼沒有想到從那裡下車，換乘一趟車去蒙特勒看一看呢？納博科夫去世之前曾經住過的賓館就在這個濱湖小城。我回家后在地圖上查了一下，發現洛桑距離蒙特勒只有不到半小時的車程，不到半小時啊，真懊悔！一個人在路上稍不留意，就會自動地被某個既定的目的地所約束，我當晚為什麼覺得自己非要趕到日內瓦呢？我明明知道，從日內瓦返回紐約的班機是第二天下午五點，中間還有十幾個小時可以消磨。現在回想起來，我本來可以偏離英特拉肯一日內瓦的路線，從洛桑下車，換乘另一趟列車，繞個小彎路去蒙特勒，說不定我在納博科夫住過的賓館裡，會有一兩個新的發現，當然，這也很難說……

很湊巧的是，過了幾個月，我申請的一筆研究經費批下來了，這意味着第二年夏天，我又能去歐洲旅行一次。劍橋大學圖書館裡保存著英國海外聖經公會的檔案，我計畫在那裡查一些有關鴉片戰爭期間來華傳教士的資料，為我正在寫的一本書做準備。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我打算在劍橋的研究完成之後，從倫敦飛往柏林去探望我妹妹一家，如果時間充裕的話，再從柏林乘火車去德萊斯頓，然後，去布拉格……

在此之前，我雖然從未去過劍橋，但腦子裡似乎已存留著一些頑固的印象：三一學院的古老庭院，國王學院的禮拜堂，中世紀風格的基督教堂，大学城裡那

條秀美的康河（也稱“劍河”），河上有一座著名的“哭泣橋”。後來我問自己，這些印象都來自何處？想來想去，似乎都出自同一个源头，那就是五四時期留學英國的那一代人的詩文，尤其是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還有他的一些詩歌，比如《再別康橋》：

……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艷影，
在我的心頭蕩漾。

軟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

上中學的時候，我們讀的不都是這一類的詩文嗎？記得我讀博的時候，選過一門現代英國詩歌的課，在課上聽教授談起二十年代的劍橋大學，常常會描述那裡的詩歌氛圍，當時我驚訝極了——五四那一代人給我們傳遞的信息是多麼有限。

徐志摩去劍橋大學，據說是因為他在倫敦的時候，正好和林徽因的戀情受到挫折，於是決意離開，放棄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學習計畫。1921年春，他來到劍橋，成為國王學院的特別生，先後大約待了有一年半的時間。雖然徐志摩在劍橋逗留的時間不長，但這次經歷居然成為他的人生新起點，從那時起，他的志趣就開始由政治學轉向文學。

初抵劍橋時，徐志摩充滿了新鮮感，他寫到：“從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風光也被我佔著了”。這裡所說的黑方巾和黑披袍，指的是劍橋本科生在正式場合，或在某些規定的場所，必須穿戴的學位服。我用心琢磨這句話，不知道他說的“佔著了”是什麼意思，究竟是說他自己也戴了黑方巾，身穿黑披袍呢？還只是站在國王學院橋邊的那棵古樹下，觀望那些身著黑方巾和黑披袍的劍橋學生呢？我的猜想是後者。徐志摩當時只是國王學院的特別生，不算是正式註冊的劍橋學生，因此他不可能穿上黑色的本科生學位長袍，也不可能住在劍橋大學的學生宿舍裡面。事實上，他一直住在校外，住在校外的好處是，不必像劍橋學生那樣夜晚翻牆回宿舍，動輒被門房處以罰款。

徐志摩來到國王學院的那年春天，留學生納博科夫已是劍橋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他的宿舍在三一主院的西南角，斜對面就是牛頓當年住過的宿舍。納博科夫對他在英國留學那幾年的記憶，與徐志摩的溫馨回憶恰成鮮明對照，用納博科夫自己的話來說，那是一段隱晦和潮濕的時光，從一開始就充滿了不祥的預兆。

二十歲的納博科夫在 1919 年 10 月 1 號正式註冊，成為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學生。報到那天，他身穿黑中透藍的學位長袍，頭戴黑方帽，去見導師哈里遜，但很快就發現自己几乎走進了一場荒誕劇。根據納博科夫在自傳裡的回憶，大致的情境應該與我如下的描繪相差不遠。

導師的辦公室在二樓，一年級學生納博科夫走上樓梯，來到哈里遜辦公室門前，沉重的大門虛掩著，他敲了一下。

進來吧！

一句短促的聲音從遠處傳來。

已是黃昏時分，納博科夫穿過前廳，小心翼翼地走進導師的書房。書房的光線很暗，只有大壁爐那邊透過來一息微弱的火光，他隱隱綽綽地看見壁爐前擺著一把椅子，看不清椅子上坐著什麼人。納博科夫向前跨了一步。

我的名字叫……

話音未落，納博科夫不小心一腳踢翻了哈里遜先生放在座椅旁邊的茶具，壺裡的茶葉全部翻倒在地毯上。哈里遜不滿地嘟囔了一句，從座椅上斜過身來，伸手把茶壺扶正，然後用手指頭掬起茶壺口吐出來的那一團黑糊糊的茶渣，又把這團東西重新塞回茶壺。

這一類的事情似乎時常發生在納博科夫身上，讓他窘迫不已。對於一個在聖彼得堡長大、嬌生慣養的俄國貴族後裔來說，劍橋的學生生活實在難以忍受，尤其是宿舍裡的寒冬。他寫道：“冬天的寒冷讓我苦不堪言……早晨起來，水罐裡總是結著一層薄冰，用牙刷輕輕地一敲，薄冰立刻成為碎片，把水罐弄出叮噠的響聲。”也許這種叮噠聲還悅耳，但每天早晨起床，是一場逃避不了的磨難。納博科夫身穿單薄的睡袍，胳膊下面夾著一包浴具，打著寒噤從宿舍走到浴室，途中要穿過那個狹窄的三一巷。由於他喜歡瀟灑，拒絕像英格蘭人那樣貼身穿毛衣，所以他身上穿的那件從倫敦買的紫紅色睡袍，必定讓他經受零度以下氣溫的考驗……

6

這個三一學院和徐志摩所在的國王學院同處一條街，相距不遠。兩者之間僅隔著另外兩個學院，聖約翰學院和岡维尔-基兹学院，後者俗稱基兹学院。劍橋大學的主體，與牛津和歐洲其它古老大學一樣，是由幾十座本科生學院——即開明文理學院 (liberal arts colleges)，這是我自己的譯法，因為“博雅學院”的譯名含糊其辭——組成的。至二十世紀初年，劍橋已擁有 23 個本科生學院，現在擴充到 31 個學院。本科生生活在各自的學院裡，但他們可以在劍橋大學的任何院系選課。我猜想，當年徐志摩站在國王學院橋邊的那棵古樹下，觀望那些頭戴黑方巾、身披黑披袍的劍橋學生的時候，未必沒有看見納博科夫的身影在他的面前走過。我甚至懷疑，在 1921 年初夏的某一個清晨，徐志摩可能與穿著紫紅色睡袍的納博科夫在三一巷的拐角處不期相遇，但彼此並不認識。

兩人擦肩而過，各自走向一個未知的命運。

人們很難想像，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劍橋並不像今天這麼平和寧靜。在那時，這裡是一個充滿激烈理念衝突的地方，空氣裡充滿了硝煙——思想

和思想的交鋒同樣是真正的戰場。從納博科夫的回憶和其他劍橋人的記載中，我們多少可以領略到當時的氣氛，在這裡，英國同學奈思畢特的出場尤其關鍵。奈思畢特信仰社會主義，這樣的年輕人在劍橋大學的中間很普遍，他們都想從納博科夫的口中了解一些關於俄國革命的事情。比如，奈思畢特經常找納博科夫聊天。這人身材修長，舉止優雅，顯然來自於有教養的家庭。兩個人聊天的時候，奈思畢特會不停地擺弄他的煙斗，一邊抽煙，一邊耐心地聽著納博科夫對俄國革命的抨擊。

但無論如何，你必須承認列寧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他改變了世界，奈思畢特說。

沒錯，他改變了世界，納博科夫激烈地反駁道。你知道他是怎樣改變世界的嗎？英國人孤陋寡聞！你們聽說列寧殺人如麻嗎？你們聽說多少人被布爾什維克扔進牢籠，遭受酷刑，被流放嗎？

奈思畢特倚在壁爐旁邊，把煙斗在壁爐台上磕了幾下，叩出裡面的煙灰，他的兩條長腿換了一個姿勢，又重新悠閒地交叉起來；那兩隻手始終不停地動作，他不慌不忙地把煙絲裝好，打火，點燃，深深地吸上一口，這才把煙斗從口中拿開，繼續說道：

你家人的不幸，我說過我很同情，但你別忘了，列寧發動的是一場從未有過的革命，革命能不流血嗎？何況，資本主義國家對蘇維埃新政權進行了全面的封鎖，特务间谍天罗地网，時刻在威脅著它的生存，你说它能不整天紧张，有过激的反应吗？再说，從前的沙皇統治殘暴不殘暴？列寧推翻的是沙皇統治，還有你們這些白俄貴族，要不然，他怎麼能讓工人農民當家作主？

納博科夫寸步不讓，他說：像你這樣整天坐在安樂椅上的社會主義信徒，不如搬到蘇聯去住着，你去親身體驗一下蘇維埃政權的厲害好不好？我敢打賭，列寧會把你這樣的知識分子全部趕盡殺絕，就像農民捕殺野兔那樣毫不留情，到時你还唱什麼高調？剛才提到沙皇時代，我告訴你，即使在沙俄最黑暗的年代，我們還能聽到不同的聲音，可是現在呢？現在……

奈思畢特把煙斗從嘴裡拿出來，在空中做了一個優雅的手勢，打斷了納博科夫的話。

他笑著說：恕我直言，自由言論從來就不是貴國的傳統，這和布爾什維克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換個話題吧，我一直想問你，你怎麼看馬雅可夫斯基？

陰郁
的雨
飛着斜的目光，
電線流着鐵的思想，——
像鐵窗一樣
清清楚楚……

奈思畢特一字不差地背誦了馬雅可夫斯基這首詩，納博科夫聽罷，沉默了一會說：馬雅可夫斯基的語言，屬於我們這個時代，很有力量，我承認他的原創性超過魯伯特·布魯克，不過，我本人更喜歡普希金……哎，先不要轉移話題，你們英國人對俄國的了解太過膚淺……

魯伯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是他們兩人共同喜愛的英國詩人，可惜他英年早逝，去世前曾是國王學院的寵兒。納博科夫在大學期間將布魯克的幾首詩歌譯成了俄文，經常和奈思畢特在一起議論他；他們當時還常談到另一位詩人，這人名叫郝斯曼(A. E. Housman)，就生活在劍橋。納博科夫是三一學院的學生，

郝斯曼是這個學院的院士，教授拉丁文學。晚上在學院的餐廳裡，納博科夫偶爾碰到這位教授詩人，郝斯曼面色陰鬱地往教員高桌那邊走，上唇的鬍鬚像茅草一般地耷拉在嘴角兩邊，這一類的細節也成為納博科夫和奈思畢特的談資。在當時，布魯克和郝斯曼都是英國最知名的詩人，劍橋本科生喜歡在背後議論他們，是不奇怪的。

7

在英國同學中，奈思畢特最早成為納博科夫的朋友，說不定也是他惟一的英國朋友。有了這個當地朋友的引導，納博科夫才有幸進入劍橋大學的特有文化圈，也才有幸了解並且遵守劍橋本科生的那些不成文的禁忌。本科生的這些禁忌不但繁複，而且讓納博科夫，也讓今天的人覺得怪異。比方說：

禁忌之一，在任何情況下，見人都不握手，不點頭，不問早安。碰見熟人，包括碰見教授的時候，咧嘴一笑，或者高喊一聲就行了。

禁忌之二，無論天氣有多冷，外出不得戴帽子，不得穿大衣——這一條其實不易遵守，原因是納博科夫最不喜歡穿英格蘭毛衣，他不穿大衣就得感冒。

禁忌之三，不得被學校制定的任何規矩所束縛，絕不循規蹈矩，晚上需要翻牆時，就翻牆。

新朋友奈思畢特身上有一種頹勁，這叫納博科夫很欽佩，但他很快就明白，除了在文學上有共同的興趣和愛好，兩人可以彼此欣賞之外，在政治上，自己永遠不可能與這位朋友志同道合，更不必說在經常的辯論中說服他了。那個時代的劍橋大學，像奈思畢特這樣的左翼知識分子有一大堆：費邊社會主義、共產黨、工黨、女權主義、布盧姆斯伯理團體(Bloomsbury Group)、使徒會、邪學社、裸體派等，這些人聚在一起時，總是進行無休無止的思想辯論。1917年俄國革命爆發以後，這些英國人全都對俄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開始注意到劍橋大學新到的幾位俄國留學生，這些俄國學生是尾隨父母，來到西歐國家避難的青年。

一天下午，納博科夫被一個左翼學生團體叫去做公開講演，請他從白俄流亡人士的角度談談俄國革命，為當地的聽眾現身說法。這對納博科夫來說，難度不小，因為他一直不善於在公眾面前講話，也不喜歡捲入政治，更不必說做政治演講和辯論，所幸的是，他有超人的記憶力。此刻，這個特長幫了他的忙：納博科夫的父親曾是沙俄時代的杜馬議員，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政論家，經常在報刊上發表言論，當時就在柏林主編一份由他創辦的俄國流亡人士的報紙。納博科夫找來父親的一篇時政論文，在主席台上把它流利地背誦了一遍，大意是譴責列寧的一黨專政，指責布爾什維克斷送了俄國的民主前景——我們可以猜想，納博科夫當時背誦完畢之後，定然大大鬆了一口氣，但當時的場面卻出乎他所料：這番背誦結束後，台下的聽眾馬上舉手提問，一個接著一個的尖銳問題，猶如萬炮齊轟，不善言辭的納博科夫完全不知所措，只好搪塞幾句，倉皇逃跑。

不久以後，劍橋大學右翼學生的一個組織也開始向他靠攏，希望拉他參加右翼團體的活動。但納博科夫很快就發現，這些人向他示好的原因很簡單，純粹為了反共，他對這個淺薄的理由是很不屑的。又過了一段時間，他注意到，這個右翼團體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出於各種不同的動機湊在一起的雜牌軍，他們各自心懷鬼胎，其中既有老牌帝國主義的吹鼓手，有種族主義分子，還有來自俄羅斯的白俄流亡人士。對那些失去家國的俄國同胞，納博科夫尤其感到失望，他們斤斤計較於個人得失，一面為自家的房產地產被剝奪一事痛心疾首，一面卻弄不清自己究竟是反對克倫斯基，還是反對列寧，納博科夫後來在自傳里寫道：

我對蘇維埃政權的不滿始於 1917 年，但我的不滿與財產之類的事情毫無關係。有些白俄移民“痛恨赤黨”，因為赤黨“偷走了”他們個人的錢財和地產，我對這種人的蔑視簡直無以復加。多少年來，我思念我的故鄉，因為我痛感自己逝去的童年永不復還，而不是在哀傷一大疊丢失了的鈔票。

納博科夫認為，這些右翼人士狹隘自私、頭腦混亂，如果與他們為伍，那是一件很可恥的事。但他也感到很無奈，因為他不得不繼續忍受奈思畢特的列寧主義和他的煙斗。

事實上，納博科夫的家族和沙俄時代所有的顯赫世家都一樣，在 1917 年的革命風暴來臨之前，一直享受著貴族階級的絕對特權。在孩童和少年時代，納博科夫和他的弟妹們，多數時間都是在彼得堡郊外的魏拉公館度過的，那裡是孩子們的世外桃源，家中僱了五十多個奴僕，伺候他們的起居。納博科夫從小陶醉於魏拉公館周圍的自然風光，他讀書、下棋，到河邊散步；高興時，鑽進濃密的杉樹林裡面，捕捉罕見的蝴蝶標本；稍後，他把自己心愛的姑娘帶到那裡去幽會。維拉公館的平靜生活是如此天經地義，直到有一天，也就是納博科夫十九歲的那一年，所有的這一切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化為煙塵，他自己一下子成為一名落難公子。在家人顛沛流離逃往外國的路途中，納博科夫首次品嚐到人生的心酸。

8

納博科夫成為小說家以後，他慣常使用分身術或折射法，把自己內心最隱秘的東西投射到小說的人物身上。而且，當納博科夫筆下的人物是一位作家，那麼在這個作家創造的文學人物身上，我們就能捕捉到更多的蛛絲馬跡。翻開《塞·納特的人生真相》第七章，主人公納特在他自己的小說裡，敘述他——納博科夫？——在劍橋大學時的心理狀態：

我大腦裡的天窗、蓋子、門無時無刻不是一齊敞開的。多數人的大腦都有星期天，我的大腦卻不肯休半天的假。這樣持續不斷的警醒給我造成了極端的痛苦，後果很糟糕。一件平常不過的事，輪到我，就變得極其複雜，它會在我的大腦裡勾起一連串的聯想，拐彎抹角，莫名其妙，一點實用價值都沒有，因此，我或者乾脆放棄不做，或者由於精神過於緊張，把事情搞得一團糟。一天早上，我拿了幾首在劍橋寫的詩，去找一個刊物的編輯，希望他能發表。結果，不知為什麼，我說出的話完全不是我想要跟他說的

話。也許是因為這位編輯說話口吃，有點特別，再加上屋頂和煙囪之間的線條構成了某種圖案，窗戶玻璃的瑕疵又將這個圖案輕微變形——所有這一切，包括屋裡散發的那股霉味（是不是字紙簍裡的玫瑰花腐爛了？），一下子攪亂了我的心緒，結果我的思路不知跑到哪裡去了，於是，我居然向這位初次見面的陌生人透露了我們倆共同認識的一位朋友的寫作計畫，這本來是人家讓我替他恪守的秘密，但話已經說出了口，才想起來，也就後悔莫及了。

我猜測，這是納博科夫自己的一次真實經歷。為什麼這麼說？因為他剛到劍橋那一年，寫過幾首不成熟的英文小詩，這幾首詩白紙黑字地印在劍橋《英文評論》（*English Review*）上，發表的時間是1920年。由此看來，那位口吃的編輯很可能就是《英文評論》的主編。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納博科夫是一個內心極其敏感，想像力格外豐富的人。如果逃避政治是他的最終選擇，那麼當他遠離故土，必須每天說英文、寫英文的時候，他大腦的天窗是如何面對流亡的這個現實？如何面對文化上的斷裂和傷痛？

對於流亡中的作家來說，文化斷裂的意思很具體，因為在日常生活中，他只能和人講外語，沒有機會講母語。我發現，這樣的傷痛經歷一次又一次地在二十世紀的作家和詩人身上重演。我記憶中特別深刻的一次，是詩人北島的朗誦，時間大約在九十年代初。當時我住在美國加州的伯克利城，那天晚上，伯克利的“黑橡樹”書店擠滿了聽眾，在眾人期待的目光下，北島走到台前。這是我第二次在美國見到北島，他那些年始終在北歐各國之間顛沛流離，這次得到美國筆會的邀請，才來到美國的西海岸訪問。我發現，北島瘦削的面容上增添了一層憂鬱的陰影，他站在麥克風前，平靜地說，最近我寫了一首新詩，叫做《鄉音》，然後輕聲念道：

我對著鏡子說中文

一個公園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樂

冬天沒有蒼蠅

我悠閒地煮著咖啡

蒼蠅不懂得什麼是祖國

我加了點兒糖

祖國是一種鄉音

我在電話線的另一端

聽見了我的恐懼

於是我們迷上深淵

我當時的印象是，這首詩的意象準確到家，隔了多年以後再讀，依舊如此，叫人難忘。一個人獨自對著鏡子說中文，這近乎於瘋狂的舉動，比任何一種修辭都夠傳達流亡者的心境，它讓我想到北歐的冰天雪地，想到那些漫長無際的長夜；每讀這首詩，它必然在我的頭腦中喚出無聲的《尖叫》那樣的畫面，與挪威畫家蒙克對瘋狂的理解十分吻合。

詩歌，這棵救命的稻草，為淪落他鄉的流亡者指點迷津，它何嘗不是一種宿命？

有一天，納博科夫在劍橋逛舊書店，發現一部四卷本的《活著的俄語詞典釋解》，如獲至寶，當即買來，他發誓每天讀十頁，一直不停地讀下去。因為在這段時間裡，納博科夫忽然陷入一場巨大的恐懼之中，這是他離開彼得堡後的第一次精神危機。面對流亡這個鐵打的事實，面對他自己永遠可能要流亡下去的前景，二十歲的納博科夫心裡，產生了種種不祥的預感，他惶惑起來，不斷地問自己：萬一我失去了母語怎麼辦？

語言，惟有語言，才是他從俄國帶來的財富；尤其對於志在寫作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語言，那不就等於失去了一切嗎？納博科夫開始失眠。

每天晚上回到宿舍，他把《活著的俄語詞典釋解》、普希金詩集、果戈裡和托爾斯泰的著作都一一攤開，擺在床上，他自己則坐在這些書的中間，像發了瘋似地閱讀俄國文學，翻來覆去地讀，一直熬到天亮……

9

與這樣的經歷相比，徐志摩筆下的歐洲和劍橋大學，好像是另一個世界，它往往讓人想到明信片上的風光，想到職業攝影師的鏡頭，那是在合適的光線下捕捉到的理想畫面，明暗對比、色澤濃淡都有安排，恰如一個旅遊者的夢。

相比之下，我們在劍橋詩人燕卜蘇差不多同時期的詩歌中，會碰到這樣的開頭：

她此刻衝著湖水刷牙

……

這是燕卜蘇一首詩的名句，粗狂率性，故意把人嚇一跳。這樣的景觀，很難入畫，更不必說和明信片上的風光相提並論，事實上，燕卜蘇的方式更貼近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現代人的情感世界。

燕卜蘇發表那些詩歌的時候，他還是劍橋大學莫德琳學院 (Magdalene College) 的本科生。燕卜蘇很早被理查茲教授 (I. A. Richards) 看重，並在他的保護傘下寫詩、辦刊物，火辣辣地放任他的文學才華。後來由於理查茲教授的引薦，燕卜蘇在抗戰時期來到中國，在西南聯大教授英國文學，他的學生中有王佐良、李賦寧、還有詩人穆旦，據說艾略特、奧登這些現代詩人得以進入中國大學的課堂，也是燕卜蘇的功勞。

我粗粗算了一下，這三個年輕人——納博科夫，燕卜蘇，徐志摩——在劍橋大學邂逅的時間，前後既有重合，也有相隔不出三四年的。在這幾年裡，英國現代主義詩歌的實驗，正如布盧姆斯伯里成員的裸泳，已經在劍橋內外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劍橋的右翼保守派學生不時地和布盧姆斯伯里團體發生衝突，打砸搶這一類的事也時有發生……

徐志摩的詩歌生涯也始於劍橋大學，奇怪的是，他的繆斯好像來自另一個時代，一個完全不同的情感王國。有人說，徐志摩是浪漫主義詩人，我們最好且不忙把他歸入浪漫主義文學傳統，他的很多想法也許浪漫，可他的詩歌是不是浪漫主義詩歌，還有待於批評家進一步評判。但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他和納博科夫都是外國留學生，又差不多同時都在劍橋，為什麼這兩個人眼裡的劍橋大學，會出現如此大的反差？這裡面反映的是詩人性格上的差異？還是生活遭際的不同？抑或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使然？

對此我想了很久，檢索了不少有關徐志摩去英國留學的材料，其中有一個發現為我提供了一把鑰匙：那時期的中國留學生——尤其是沒有正式註冊的短期留學生——很難有機會接觸到英國學生和英國社會，我甚至懷疑，徐志摩與布盧姆斯伯里團體究竟有沒有真正的接觸？實際的情況是，徐志摩並不住在劍橋，他租的房子在郊外一個叫做沙士頓的地方，這地方距劍橋足足有六英里之遠，而且他每次去一趟劍橋都不太容易。我覺得，徐志摩吟詩賞月，自娛自樂的方式，可能是因為他沒有機會融入劍橋那個特殊的小社會，這當然也許還有其它的原因，但無論如何，與世隔絕是最直接的原因。畢竟，旅遊和流亡，兩者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徐志摩從來沒有像納博科夫那樣，參與那些充滿硝煙的辯論，被捲入大學生中間無處不在的思想衝突之中，這既是他的不幸，也是他懵懵懂懂的福分。

如果稍加留心，我們就會發現，在徐志摩訪問劍橋的時候，詩人艾略特的名字已开始在剑桥文人中間傳來傳去，儘管《劍橋評論》(Cambridge Review) 的主編當時不以為然，1922年刊登一條消息說：文壇上出現了一個新刊物，發表的是艾略特先生寫的那種似詩非詩的東西。我敢肯定，他說的新刊物就是艾略特主編的季刊《標準》(The Criterion)，他的名作《廢墟》(The Waste Land)——中文通常譯為《荒原》，不幸的是，這一類的誤譯造成了國內對現代主義詩歌的長期誤解——就是在這一年公佈於眾，發表在《標準》的第一期。

艾略特的《廢墟》应该就是《劍橋評論》裡批評的那種“似詩非詩的東西”，徐志摩雖然人在劍橋，但似乎對此並無耳聞，不過，即便是他當時聽說了艾略特的名字，或者讀過《廢墟》這首詩，他未必就能理解和欣賞一個尚未被英國主流文壇承認的詩人。我的判斷並不是沒有依據，因為弗吉尼亞·伍爾夫出名之前，徐志摩對她和她的畫家姐姐頗有微詞，似乎很瞧不起，反而向國人極力推薦凱瑟琳·曼斯菲爾德。事隔幾年，伍爾夫在英國一躍成為大紅大紫的現代主義小說家，徐志摩馬上修正自己的看法，再次造訪英國的時候，他又想方設法要採訪伍爾夫。

文壇上的這些人物行狀，一般都逃不過魯迅的犀利目光。魯迅原本就不喜歡新詩，自然更不喜歡徐志摩的詩文所代表的輕浮趣味。1924年，魯迅與同仁創辦《語絲》，徐志摩得知消息以後，馬上積極地投稿，可是，他萬萬想不到，魯迅為了遏制他的投稿熱情，竟在一篇雜文裡寫了一首戲仿徐志摩的新詩，詩曰：“唳，玲瓏零星邦滂砵珉的小雀兒呵，你總依然是不管甚么地方都飛到，而且照例來唧唧啾啾地叫，輕飄飄地跳麼？”如此一來，徐志摩果然就停止投稿了。

10

既然艾略特在1920年代默默無聞，那麼英國詩壇當時的領軍人物是誰呢？

說起來，嚇人一跳，因為很少還有人記得他們的名字。一位是納博科夫在大學時代翻譯過的詩人布魯克，另一位就是納博科夫在三一學院的餐廳裡，傍晚碰到的拉丁文教授郝斯曼。在當時，這兩位英國詩人都有大批的粉絲追捧，儘管對今天的讀者來講，他們的名字已經十分陌生，作品也差不多被文學史家所遺忘。令人感慨的是，在1920年代，英國有誰不知道布魯克和郝斯曼的大名呢？據說，布魯克的詩歌和他本人的美貌，曾讓英國人——無論是女人還是男人——都為之傾倒。愛爾蘭詩人葉芝曾盛贊說，布魯克是英格蘭最英俊的小伙子。布盧姆斯伯里團體的現代主義作家伍爾夫，在言談中竟也忍不住會夸耀，她曾經在月光下與布魯克在劍橋水中一齊裸游……

說起來，劍橋最著名的裸游人士，還不是在月光下幽會的那些詩人和作家，而是大白天也可能出現在康河水中的年輕科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如果世上還有誰沒聽說過李約瑟的名字，那起碼對他那部多卷本的《中華科學文明史》——另譯《中國科學技術史》——應該有所耳聞，因為這部鴻篇巨著一直都在改變著世界文明史的書寫。不過，李約瑟從1918年到1921年在劍橋大學基茲學院就讀本科生的時候，他所學的專業不是歷史學，而是生物化學。對於一個天才來說，循規蹈矩不是他的本分，李約瑟三十歲出頭被選為皇家科學院的院士，成為世界頂尖的科學家，後來由於各種偶然和陰差陽錯——中間牽涉到一個偉大的愛情——他旋而轉向科學史的研究，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歷史學家。

11

這樣的人生轉折發生在很多人身上，只是時間各異罷了，有的人早一些，有的人晚一些，其中有種種誘因，都難以說清，通常是越解釋越不清楚。但凡注定要發生的，早晚都會發生，比如我正在寫的這篇文章，說是散文，不很像散文，說是隨筆，不很像隨筆，說是小說，又不很像小說，更不是人物傳記或學術論文，儘管也有一些學術研究在裡面。寫這樣一篇四不像的東西，何以早不寫，晚不寫，何以偏偏寫在此時？這也是許多偶然促成的。生活中存在著大量的謎，往往都是我們解不開的謎。拿納博科夫來說，當年他在劍橋大學讀書的時候，假如沒有輕易地放棄生物學而轉向文學的話，那麼他日後能成為《洛麗塔》的作者嗎？

納博科夫從小就著迷蝴蝶標本的採集，到了中學階段，他的蝴蝶知識幾乎達到了專家水平。1919年剛踏進劍橋大學的時候，他首先想到了生物學，打算將來當一名科學家，這是很自然的選擇。他開始修了一門動物學的實驗課，這門課要求學生實習動物解剖，實驗室裡提供了大量的魚，供學生解剖使用。納博科夫拿起解剖刀，在實驗室的台子上開始解剖魚。一個月過去了，他仍舊在實驗室的台子上解剖魚；兩個月過去了，他的鼻子開始作怪，無論走到校園的哪一個角落，他到處都嗅到魚腥味。等到學期結束的時候，納博科夫突然脫下實驗室的工作服，宣布說，從此不做生物學，要改修文學。畢業前夕，納博科夫主修了法國文學和俄國文學，嚴格地講，這就是比較文學，不過，當時還不叫比較文學。

傳記作者薄亦德（Brian Boyd）對納博科夫在實驗室的生活，做過一些具體的描述，但我認為，他的故事明顯有漏洞。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劍橋大學動物學的實驗室裡，為什麼除了魚，就沒有其它動物供學生解剖呢？比如老鼠、兔子、或者青蛙。像大科學家霍爾丹那樣在自己的身上做實驗，把自己整得死去活來的教授，人們也偶有耳聞。我猜想，假如納博科夫沒記錯的話，那麼，他大概是把解剖魚的事誇大了。誇張，畢竟是作家慣用的手法。

想想看，納博科夫在動物學的實驗室解剖魚的時候，李約瑟已經是劍橋二年級的學生。他們相互認識不認識呢？我的猜測是，他們彼此並不陌生，但我的困難是，找不到直接的證據。至於他們兩人是否在同一門課上見過面，打過招呼？那就更加無法得知了。

有一點可以肯定，李約瑟是不怕解剖魚的，不僅如此，他在劍橋的實驗室裡還如魚得水，很順利就攻下了生物學的學位，然後直接被研究生院錄取，繼續深造，成為劍橋的碩士生，繼而當了博士生。就在納博科夫決定轉修文學的一年以後，科學家李約瑟也作出一個新決定：他參加了剛剛成立的英國裸體協會。要說前者的決定有著某種水到渠成的意思，後者就顯得多少有些離奇了。這兩件事之間到底有沒有聯繫？必須承認，應該沒有什麼必然聯繫，只是時間和地點上的交叉罷了。其實，世上發生的很多事情，如果說它們之間有什麼聯繫的話，通常也都是時間和地點上的交叉和巧合，或者還有佛家所講的因緣。遺憾的是，歷史學家經常趁人不備，把他們想像出來的因果關係和歷史邏輯，強行塞進這些複雜的巧合裡面，然後利用敘事的手法說服我們。

12

劍橋大學這種地方，在有些方面很像我曾經居住過的美國加州的伯克利城，怪才名士居多，所以也就見怪不怪。李約瑟的傳記作者文思森（Simon Winchester）說，在二十年代的劍橋城，裸體行為和各種怪人怪舉，都能得到人們的諒解和容忍。只要公開裸體不傷害他人，不嚇跑街上的馬匹，不造成交通事故，一般很少有人過問，更不會大驚小怪。徐志摩筆下的那條已然具有“靈性”和“秀麗”的康河，就是李約瑟和裸體協會的成員經常現身的場合。這些自然之子，往往不分時間場合，突然赤裸裸地在康河的水中浮出。

如果碰巧有淑女們划船經過，她們就趕緊掩面，不敢斜視，像鴛

鳥一樣把頭藏在陽傘下面，用眼睛拼命地盯著蕩漾的水波，期待

著這場突襲運動儘快結束。直到河水徹底恢復了它先前的體面之

後，淑女們才敢把頭抬起來。

這一段有趣的細節，是文思淼在翻閱達爾文的孫女拉佛拉特的童年記憶時，為我們發掘出來的。

英國裸體協會于 1922 年成立，在劍橋吸引了一批前衛人士，他們中既有布盧姆斯伯里團體的成員，也有行為古怪的科學家。這個組織的規定是：入會人員必須使用化名——比如像“奈思畢特”這種化名，會員在進行裸體運動時，渾身上下都不得有任何穿戴，必須做到一絲不掛，惟獨允許頭上系一條彩帶，或腳上穿一雙涼鞋。他們喊的口號是，恢復古希臘人的天體。

篤信這種理念的人並不孤立，至少魏晉時期劉伶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室為衣褲的放浪，就可與劍橋的裸行媲美，只是那個時代的中國文人，或許態度更加坦然。不過，魏晉文人的狂放，劍橋學子的蕩行，都畢竟是歷史，現實生活往往是另一碼事——二十世紀初的英國社會對待怪傑們的態度，要远比一百年後的美國社會開放和寬容，這聽起來似乎有點奇怪，然而事實。

我想起一個外號叫做“光身漢”(the Naked Guy)的人。我先是把這個外號譯成“裸體人”，後來覺得不準確，因為與“裸體”相對應的英文詞是 nude。“光身”和“裸體”的詞義區別很大，這個區別就在一絲不掛的 naked 和帶有藝術遮羞布的 nude 之間，不然我們就無法解釋後來發生的事。我說的這個“光身漢”，一度是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的學生，大凡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伯克利城生活過的人，都不會沒有在街上碰到這位“光身漢”，即使沒有碰到，也聽別人說過，因為此人太出眾了。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走在伯克利電報大道的人行道上，忽聽身邊有人低呼一聲 Here comes the Naked Guy (“光身漢”來了)。我一扭頭，只見一輛自行車飛奔過來，車輪緊貼人行道的邊緣呼嘯而過，騎車人果然渾身一絲不掛，皮膚在明亮的加州陽光下閃閃發光。這人高個長腿，英氣勃發，背上跨著一隻雙肩包，足下登著一雙涼鞋。“光身漢”的光身行為，一度轟動伯克利全城，在大多數師生和市民心中，這個人形象很酷，大家不覺得他的行為對社會構成什麼威脅。後來我才知道，此人名叫馬蒂尼茲，當時是伯克利的在校學生。記者問他，為什麼要當眾裸體？他回答：我不認同中產階級的價值觀，他們花大筆的錢買衣服穿，無非是招搖過市，炫耀自己的身份等級。灣區這個地方天氣溫和，人不穿衣服，可以活得更逍遙自在一點。

後來聽說“光身漢”被多次告上法庭，被控患了精神病，接著他又失業，進監獄，直到 2006 年 5 月的某一天，他在被關押的加州矽谷的一家監獄自殺。那時，我早已離開伯克利，聽到他受迫害致死的消息以後，心裡很難過。馬蒂尼茲僅活了 33 歲。

13

我動身前往英國劍橋的前一個月，曾給劍橋大學圖書館的英國海外聖經公會檔案部的負責人去過一信。信中描述了我的研究計畫，希望在資料方面得到檔案部的協助，沒等對方回信，我就出發了。先飛往倫敦，然後從倫敦的國王十字路車站上火車，一小時後，火車抵達劍橋城。乘天黑之前，我搭乘一輛出租車，找到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的招待所下榻。

夏日的英倫島，天氣變化無常，每當冷空氣襲來的時候，猝然降溫，叫人措手不及。我來時只帶了幾件單薄的夏裝，根本沒有禦寒的準備，到了這裡才發現，英倫島的夏天很像舊金山的天氣，毫無夏日的氣息，天黑之後，更是涼如秋夜。我把行李安置好後，打聽到附近有家義大利餐館，馬上動身前往。天剛下了一場雨，冷氣襲面而來，我打著寒噤，加快腳步，邊走邊想到一句著名的格言：“最寒冷的冬天就是舊金山的夏天。”這句話是誰說的？馬克·吐溫？不過，據說好事者在馬克·吐溫的書中翻過，找不到這句格言的出處。反正無所謂，我的切身體驗是，最寒冷的冬天是英倫島的夏天。

穿過幾條街，拐過一個十字路口，疾走幾步，我就找到了那家義大利餐館。進去叫了一盤熱騰騰的用菠菜汁做的通心粉，一口氣吃下去，這才覺得自己身上的血液在冰冷的四肢內重新循環起來。

晚上回到招待所，有人提醒我說，在圖書館辦手續，可能要排隊，最好早起。第二天早晨，天氣放晴，我的心情馬上明朗起來，早早就來到圖書館大樓，發現門前已有十幾個人在那裡排隊。九點鐘，圖書館準時開館，我在門口等了二十分鐘以後，進入一間接待室，於是，填表格，交手續費，領到一張閱讀證。我慶幸地想，這裡的手續雖然比美國大學圖書館要繁瑣一些，但我好歹拿到了閱讀證。

14

英國海外聖經公會檔案部的位置在圖書館大樓的南翼，我從接待室走出來，穿過大堂，拐進南側的走廊，很快找到上面寫著“英國海外聖經公會檔案”幾個字的大門。我輕輕推開門，探頭進去，環顧四周，發現屋裡的空間很大，結實厚重的書架靠牆站立，上面擺滿了書和文件夾，書架很高，一直通向天花板。大廳中央擺放幾排古雅的書桌，棗紅色的桌面擦得十分明淨，檔案館裡面空無一人，安靜得像一個修道院。正在詫異之中，我聽到一個空洞的聲音從右邊傳來：你需要什麼服務？我順著聲音看去，見到一個瘦高個的男人從右側小門旁邊的陰影中現身，然後面無表情地朝玻璃門這邊走來。待來到我跟前的時候，這人顯得更瘦更高，活像一根長了腿的電線桿矗立在我的面前。

證件？他居高臨下地問。這個英國人年齡在六十歲左右，面色陰暗，皮膚粗糙，臉上的皺紋讓人想起橡樹皮，與他那挺拔的身材極不協調。高個子左手扶在木頭門框的邊緣，右手握住玻璃門的門把，完全擋住了我的視線。

我本能地向後退了一步，從包裡翻出我的閱讀證和護照，一並遞給他，高個子拿著證件翻了幾下，又問：

有回執嗎？

什麼回執？

檔案館寄給你的預約日期。

我沒收到這個東西。

對不起，沒有事先做預約，就不能進檔案館。他不苟言笑地說，然後轉過身，預備把我關在門外。

等等，先生，我是專程從美國來看這個檔案的，長途旅行不容易，我來之前是給你們寫過信的。你現在不讓我進，叫我怎麼辦？

沒有事先預約，就不能進，這是規定。高個子絲毫沒有讓步的意思。

我明白，但我的確給你們寫過一封信。

你有回執嗎？

沒有。

那就對不起。

高個子從容不迫地把兩扇門關好，轉過身去，他的身影重新消逝在修道院深處的陰影中。我站著愣了一會，恍惚之中，覺得自己剛才在和一個幽靈對話，無奈話不投機，幽靈棄我而去。

我懷著沮喪的心情，走出圖書館的大門，坐在了石頭台階上。這時，陽光直射在台階上，白晃晃的，十分刺眼，我閉上眼睛，努力使自己鎮定下來。剛才發生的那一幕，完全出乎我的預料，一下攪亂了我的研究計畫。從前我以為這種倒霉的事情，只能在北京的檔案館發生。

遠處飄來一陣悠揚的鐘聲，抬眼望去，一個教堂的尖頂在雨後的陽光下熠熠發光。不遠的地方有隻黑鷹，正在穩健地盤旋，它一個猛子扎到低空，在那裡轉了三四圈，隨後騰空而起，逐漸消逝在西邊的天際。我低頭看錶，忽然想起，聖約翰學院 M 教授與我有約，傍晚他要請我參加教員的高桌晚餐，事前還特地交待說，客人衣著可隨意，沒有特別規定。聽到這句話，我大大鬆了一口氣。

儘管如此，下午上街，我还是給自己買了一條新款式的黑色無袖連衣裙，還是有備無患的好。

15

傍晚四點，我準時來到聖約翰學院大門口，發現 M 教授已經等在那裡。這是我第一次與 M 教授見面，他看上去五十歲出頭，態度親和，眼睛裡閃著機智的光。我很驚訝，這位教授一點不像個書生，卻像整天在戶外活動的園丁，因為他的面部、脖子和兩隻手上面都打著陽光留下的深色印跡。幾句寒暄過後，M 教授步伐敏捷地將我引入聖約翰學院的大門，我們穿過兩進的院子，來到一座樓房門前，拾階而上。M 教授拉開一扇厚重的木門，很禮貌地請我走進去。

這是一間不大的教員起居室，牆壁上掛著幾幅老舊的肖像，肅穆莊重，細看時，畫面的油彩有點褪色，估計是幾百年前的老畫像。油畫下方靠門的地方，安置著一個安妮王后式樣的圓桌，桌上擺滿各式酒水和玻璃酒杯，四周圍著沙發和椅子。我和 M 教授走進去時，幾位教員正在壁爐前方輕聲交談，他們身披黑色長袍，給人的初次印象既是學者，又很像中世紀的修士。他們每人手裡端著一杯雪莉酒或波特酒，站在那裡說話。這時，M 教授像變戲法似的，不知從哪裡找出一件薄薄的黑長袍，也像其他人那樣披在肩上。他走過來，問我想喝一點什麼，我說只要一杯帶氣的礦泉水。不知何時開始，我略感身體不適，可能因為忘了吃午飯，有低血糖的症狀。M 教授將水杯遞給我，輕聲說道：現在是正餐前的雪莉酒聚會，等這個儀式過後，我們就到隔壁的餐廳吃飯。

飯前的雪莉酒儀式好像進行了很久，大家站在一起沒完沒了地說話，不斷地轉換話題，好像是沒話找話。我一邊和剛認識的幾位教授聊著天，一邊用心地打量著四周，這時教員起居室陸續地走進來十幾位聖約翰的教授和講師，他們都是清一色的男性，除了一位和我同樣的臨時客人以外，其他人都披著黑色長袍。我突然意識到，自己來到這一群修士打扮的學者中間多少有點古怪，一下子切身體會到納博科夫初到劍橋時的感覺，覺得好像自己走進了一幕戴面具的荒誕劇。我萬分小心地拿著手中的杯子，生恐也像納博科夫一樣，初次見面就惹出不必要的麻煩。在男人們安排的這種井然有序的場合下，女性難免覺得自己是一個 stranger。英語的 stranger 至少有兩層意思：一是陌生人，二是外國人，我呢，兩者兼有之。

終於，晚餐的鈴聲響了，起居室通往餐廳的門忽然被人打開。身穿黑色長袍的教授和講師們緩緩放下雪莉酒杯，形成一字隊列，魚貫而入。在高桌前，我找到了印著自己姓名的卡片，在事先安排好的座位上坐下來，對面坐的是一位聖約翰學院的資深院士，他自我介紹是語言學家。

16

高桌，是餐廳專供教員使用的長條桌，它通常橫擺在餐廳的主上方，那裡的位置比學生餐桌的地面高出一兩個台階，師生雖然在同一個餐廳進餐，但師生的等級是由高桌來維持，因此，顧名思義，叫做 High Table。從那裡，教員可以俯視或監督低桌的學生，學生也有機會觀察高桌上發生的事情，同時交頭接耳，傳播一些關於教授私生活的閒話和趣聞。不過，我在聖約翰學院做客的那天晚上，學生已放假回家，餐廳比以往都安靜。劍橋高桌用餐的傳統，和牛津、德萊姆這些英國最古老的大學一樣，在維持了幾百年以後，如今依然如故。英國人對傳統文化的愛戀，只要看看這些頑強保存下來的禮儀，就一目了然。我想，這不僅僅對我，恐怕對任何一個現代中國人——無論在視覺上，還是在思想上——都會產生強烈的衝擊。

我迅速向四周掃了幾眼，覺得這裡不像是餐廳，倒像一個古樸的羅曼式教堂。高桌上方的天花板是由帶弧度的木製拱頂裝飾起來的，周圍嵌有玻璃彩窗，牆壁上鑲了近三米高的老橡木雕花牆板，上面掛著聖約翰學院歷代的著名院士的肖像。所有這些，都是活著的传统：如果高桌是天主教神壇的某種變異，那麼低桌就代表前來祈福的芸芸眾生，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古老的英國大學原本是教會的精神堡壘，亨利八世以後，大學更成為英國國教的學術重地，其時的學術，主要是基督教神學。在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的研究和傳授是大學的本義，身穿黑色長袍的教授是神學家，他們差不多是那個時代惟一的識字群體。我不由得向四周的牆上望去，可是餐廳的光線相當昏暗，完全看不清牆壁上掛著的那幾幅肖像的人物——這些人是神學家，還是科學家？

高桌兩邊的講話聲戛然而止，餐廳變得鴉雀無聲，納悶之際，我聽到高桌上方傳來一聲低沉的聲音，拉丁文的禱告開始了。不知為什麼，每次參加這種宗教儀式的場合，聽到飯前禱告時，我都會變得精神緊張，手足無措，好像犯了什麼過失，因此，真盼望這個聲音快點結束，直到眾人一齊重複 Amen 時，才暗自鬆了一口氣。禱告結束，穿黑色制服的侍者們開始走動，他們熟練地將沙拉盤子擺在每個人面前，替客人斟酒，高桌上的氣氛頓時活躍起來。

坐在我對面的語言學教授懂得世界上二十多種語言，不過中文除外。晚餐期間，他特別喜歡和我討論中文和漢字。比如，英國 Cambridge 這個名字譯成中文怎麼講？我說：前半 Cam 是音譯，後半 bridge 是意譯，從前的音譯不確定，有人用“康橋”，有人用“劍橋”。事實上，普通話“康”或“侃”字的音，更接近英語 Cam 的發音，閩南話或廣東話就另當別論了。為什麼“康橋”的譯法未能流傳下來？我說不知道，也許是歷史上什麼偶然性的作用吧。

語言學教授聽得興趣盎然，他又不停地追問，那麼在普通話裡把“劍橋大學”改成“康橋大學”或者“侃橋大學”是不是更準確呢？我笑起來，這個建議當然很好，但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東西，要想把它改過來，恐怕實行不通。我忽然想到，這個小小的翻譯問題，足以讓人體會到語言和文字捆綁人的思維和心理的力量，為什麼我們不能接受“康橋大學”或“侃橋大學”的說法？一個詞，一組意

象，似乎是一張不可摘除的、獨一無二的面具，問題是，這張面具和它後面的“真實”，亦實亦虛，亦真亦幻，有什麼理由永久地捆綁在一起？

我這一連串模糊的思緒忽然被打斷，坐在右邊的 M 教授插話道：你還記得 Joseph Needham（李約瑟）吧？他抬眼看著語言學教授說。

當然，聽說他的中文是自學成才的，非常了不起，語言學教授禁不住讚嘆起來。

你猜，他學會的第一個中文詞是什麼？

不知道，你聽他講過？

“香煙”。對一個初學的人來說，這兩個字其實不好寫。M 教授用手比劃著給語言學教授解釋道，M 教授在劍橋大學講授中國歷史，他的中文底子很好。

我心中產生了好奇，問道：李約瑟在世的時候，你們認識他？

他們兩人互相看了一下，笑了，M 教授說：天下無人不識君啊。

語言學教授接著說：我們劍橋當年有一大批紅色科學家，最著名的兩個天才，一個就是生化學家李約瑟，另一個你恐怕沒有說聽過，隔行如隔山嘛，他是大物理學家貝爾納（J. D. Bernal），外號叫“智者”。這兩個人從上大學開始，就信奉社會主義，到後來，一個支持毛澤東，另一個捍衛斯大林，至死不變，你說奇怪不奇怪。

這讓我更加好奇，於是問道：貝爾納是哪一年進劍橋的？

語言學家伸手接過侍者遞來的甜點，帶著疑問的目光看著 M 教授：記不清了，是不是和李約瑟同年？

M 教授端起他的酒杯，想了一下說：我想是一戰結束後的第二年，1919 年。

我的心咯登一下，好奇怪，又碰到這個年份。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劍橋有一批左翼科學家，真是意想不到，李約瑟和貝爾納都是被認可的皇家科學院的院士啊。

我忍不住又問道：除了這兩個人外，劍橋還有哪些左翼科學家？

語言學教授說：你聽說過生化學家霍爾丹（J. B. S. Haldane）那個怪人嗎？他是其中的一個；還有大數學家哈迪（G. H. Hardy，有人譯為“哈代”），生物學家郝格本（Lancelot Hogben），和數學家萊威（Hyman Levy）。讓我想想，哈迪三十年代才到劍橋，在此之前，他是牛津的教授，呵呵，我聽說，他的宿舍裡老是掛著列寧的巨幅畫像。這人是一個瘋狂的板球謎，在他的眼裡，世界上只有兩個人夠得上偉人布萊德曼——唐納德·布萊德曼被公認是最偉大的板球手——的檔次，一個人是列寧，另一個就是愛因斯坦……

M 教授好像猛地想起什麼，他把手中的甜點勺輕輕擱在盤子上，轉身對我說：上星期《衛報》披露了一條特大醜聞，聽說《紐約時報》也轉載了這個消息，你回去看看。報上公佈了喬治·奧威爾 1949 年向英國情報部門遞交的絕密黑名單，他的筆記本上有 135 個名字，比我們先前知道的多了一百個人。

你是說《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的作者 George Orwell 嗎？

正是這個傢伙，從 M 教授說話的語氣聽得出，他對奧威爾很不以為然。

什麼黑名單？誰的名字在上面？……我不覺愕然，不知這是怎麼一回事。

誰的名字？自然是當時的地下共產黨和地上共產黨，還有他們的同路人，比如像卓別林、蕭伯納、斯坦貝克，你信不信，就連紐約市長拉瓜迪亞也榜上有名，這人 1947 年就死了，和共產黨有什麼干係？還有我們劍橋人的名字，貝爾納、布萊克特、普里斯特利，都統統列在上面。奧威爾這傢伙是不是够陰險？

聽到這裡，我來了研究興趣：奧威爾是一個作家，他為什麼向諜報部門遞黑名單？文學和政治之間到底有些什麼瓜葛？我心想，回去把這個名單找來，好好研究一下。

17

1919年——列寧——劍橋的科學家——奧威爾的告密名單。這些閒談中的掌故觸動了我，我的腦子裡馬上想到那個煙斗不離手的社會主義信徒柰思畢特。說不定，這是一條值得追究下去的線索；說不定，困擾我多年的那個疑團就會迎刃而解。

柰思畢特是納博科夫使用的一個巧妙的面具，套在誰的身上都有可能，這裡的困難是，隱藏在這個面具背後的是不是一個有名有姓、活生生的人？他究竟是誰？李約瑟、貝爾納、霍尔丹、哈迪、郝格本、萊威，布萊克特、普里斯特利，我把這幾個名字迅速地在腦子裡過了一遍，馬上斷定，數學家哈迪暫時可以排除，因為他來到劍橋的年代太晚，時間對不上。

誰是柰思畢特？

晚上回到招待所房間的時候，我毫無睡意，躺在床上，手中握著電視機的遙控，一邊變換頻道，一邊心裡琢磨著這件事。上午碰到的那些挫折和不快，全都不翼而飛，我迫不及待地需要查找一些資料，以證實我的初步猜想。

從哪裡開始？

无名指（选章）

李陀

1

不知不觉天就黑了。

窗户外边，细雨蒙蒙。看不见的雨丝，带着寒气在窗子外边窥视，飘过来，又飘过去。时不时，带着一声爆响，就有一个大雨点砸到水气蒙蒙的玻璃上，活像一只大飞蛾想到屋子里躲雨，谁想撞了个粉身碎骨，爆成一朵透明的水花。

我一边看着窗子外面朦胧的街灯，一边吃我的晚饭——肯塔基炸鸡——十个香辣鸡翅，再加一杯百事可乐。饿坏了，我狼吞虎咽，要是现在拍个照片，这路吃相一定能给肯塔基做广告。

刚吃了三个鸡翅，门铃响了，带着一股幽幽的湿气，不理它，我继续埋头又吃又喝。可是按铃的人非常有耐心，铃声还一下比一下急，在屋子里左冲右撞，像一只找不到地方落脚的迷路鸽子。

没法子，我只好把又湿又皱的上衣从椅子上抓起来。可是，衣服还没套上身，门铃又响了起来。

来的到底是什么人？

打开门，一股寒气迎面扑来，我不由得打了个冷颤。

来人是个大高个子，西装笔挺，派头十足。奇怪的是，这人身上没一点湿，连贼亮的皮鞋上都没一点水迹，亮亮的鞋头在门口的灯影中闪着银光，很神气。只是客人的脸高高浮在暗影里，模模糊糊，一双眼睛就在这一片模糊中瞪着我，闪闪发亮。

“你是谢骆客？”

“我是，先生找我有事？”

暗影中的眼睛更亮了，能觉得出来，那光芒中有股刺人的怀疑，还有点儿蔑视。

大概楼道里有个窗子没关上，一阵带着雨意的冷风飒飒吹来。

我板着脸，一声不出。

“你是心理医生？”

到底是他先张了口，这第一回合我是赢了。

“我是心理医生，这是我诊所。”

我门口旁边的墙上有一块牌子，那牌子是黄铜做的，上边一排是隶书，另一排是花体的英文字，隶书字大，英文字小，内容都一样：**谢骆客博士心理诊所**。这位大个子客人一定看过这牌子了，但是此刻他又瞥了一眼，好像要鉴定这牌子是不是水货。

我把门一带，用送客的口气说：“先生到底有没有事？”

我以为接着我就能关门了，不料大个子突然说：“我先参观参观你这诊所，行吧？”

没等我回答，这家伙已经挤了过来。他刚向前一跨步，一股冷冷清清的酒气先重重地压到我头上，然后是宽宽的胸膛和肚子。大个子进了房间，先在只有几平米大小的前厅里站下，迅速地打量一番，然后也不得到我的允许，就几步走进

我的办公室，一边继续四处打量，一边从西服上装的口袋里掏出一包中南海牌子的香烟。

这小子如此无礼！可是再要赶他出去，已经不很合适，不如静观其变，看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

“听说，你这诊所开门不久？”

“对，不久。”

大个子不再说话，拿出一个亮晶晶的打火机，啪地打出一个长长的火苗，点燃了手里的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走到我办公桌旁边一个小沙发跟前，一屁股坐下。

“你是在美国念的博士？”

我真有点烦了，没好气地回答：“不像吗？”

大个子皱了皱眉，两眼刹时变成两把闪光的锥子，不过，这就是一刹那，接着是一丝笑容在他脸上漾开，两把锥子也在这几乎看不见的笑里溶化了，一下子无影无踪。他调整了一下坐的姿势，又吸了口烟，忽然换了种带点亲切的口气说：“我是病急乱投医。”由于带着一点东北口音，这家伙说起话来语调很硬，所以此刻这突如其来的亲切，也还是硬邦邦的，“不瞒你老兄说，我早听说有心理医生这么回事，一直不大信。人家告诉我，心理医生专治心理病，啥是心理病？我想，也就是心病吧？可人的心病也能治？——今天路过你这儿，就进来看一看，提着猪头找庙，试试吧。”

试？试你个头！

“先生，现在是我下班时间。如果你需要咨询，需要事先预约。”

“还要预约？”

“对，现在我是下班时间。”

“可我已经来了，例外一下，行吧？”

大个子把身体用力往后一靠，喷了口烟，一串灰蓝的烟圈带着明显的讥讽在空中慢慢飘散。

很明显，对付这种人绝不能被动，只有出奇兵才能制胜，于是我马上反问过去：“先生，我能不能问一句，你是做什么的？一定是位老板吧？”

从对方的反应里，我知道我又赢了一个回合。果然，大个子笑了，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里，惊奇的火星不停地闪灭：“行，谢博士，有两下。告诉你，我手底下有公司，规模还不能说很大，可也不算小。”

果然是个老板。

“请问贵姓？”

“免贵，我姓金。”

“金老板，你进来，说是参观——现在参观完了吧？我这诊所普普通通，没什么可看。”

大个子大概对我的逐客令有点不快，皱着眉看看雨珠四溅的玻璃窗子，没有马上说话。

我真的不耐烦了，还是得马上赶他走。

2

正在这时候，突然有人敲门，声不大，可是很坚决。我过去开了门，是一个被雨水淋得半湿的矮胖子，一脸麻子，灰白的寸头，眼睛似乎睁不开，有如两条细缝。这人的身上、脸上，甚至一举一动里，都有股让人想起屠夫的腥气和霸气，

很是瘁人，可是他的眼光刚一和大个子相接，马上散乱起来，一丝慌乱在脸上一闪即逝。

“老板，王颐在门外，他非要进来见你。”

大个子的脸一下沉下来：“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他到‘金太阳’找你，没找着，一下看见你的车了。”

“告诉他，我没功夫。”

矮胖子犹豫了一下：“他闹得厉害，死活要见你。”

“我没功夫！”

“是！”

矮胖子应了一声，转身向门外走，从他的转身姿势和步伐看，他肯定当过兵。我刚要把眼光收回来转向我的阔佬客人，不料一个人趁胖子开门那一瞬，带着一声哭音，一下闯了进来，不过，还没等我看清来的是什么人，胖子一个熟练的擒拿动作，已经用左手把来人抓住，一下子把这人又扔出了门外，自己也一下闪了出去。那动作太麻利了，从人闯进来，到房门嘭一声关上，前后大约也就两三秒。我几乎看花了眼，以为在看成龙的功夫片。可是，这位来人虽然被扔到门外，他那带着哭音的叫喊却隐隐约约传了进来：“金总！金总！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求你听我说几句！金总！给我一个机会！”

这人的叫声不能说很高，还带着一点文绉绉的上海腔，可不知怎么，嗓音里有一种好像用铁铲刮铁锅的金属音，非常刺耳，才听了几声就让人觉得难以忍受，非常闹心。我刚要对大个子说，他公司里的事不能在我的办公室里闹，这位金老板已经抢在我前边发了一声断喝：“让他进来！”

不等我有任何反应，门一响，胖子已经把那人又带了进来。

“金总，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一次，就一次！”

这次我把来人看清楚了，是个俗话说的那种小白脸，眼睛、嘴、脖子都带股女气，特别是嘴唇，不单唇红齿白，而且又红又艳，富于表情。

矮胖子没有把房门关严，一股凉气伴随着阵阵风雨声不请自来，屋子里一下子充满了冷意。

我本来已经要对大个子说，这是我的办公室，请他们马上出去，可这个风情万种的脸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忍住了，且看这热闹到底是怎么回事。

“机会？你要什么机会？”大个子又点起了一只烟，一点不掩饰自己眼神里的轻蔑。

小白脸从胖子那双疙里疙瘩的大手里用力挣脱出来，急急地向大个子跨了一步：“老板！金总！给我个机会，我错了，我知道自己错了！这是我的检讨书——”小白脸从已经被雨淋得几乎湿透了的西服上装的口袋里掏出一叠纸，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放在大个子的桌前。

“还有，我已经把我母亲接回我家了，今后我一定好好照顾老人家，全心全意，做孝顺儿子！这次我一时糊涂，对母亲不孝，让金总生气，我错了，我一定改！”

几粒雨珠从额头滚下，其中一个最后挂在小白脸削瘦精致的鼻尖上，在那儿聚成个小小的水晶球，但是似乎不想掉下来。

“真把你老妈接回家了？”大个子瞥了小白脸一眼。

“昨天晚上接的，还给老人家买了新的轮椅，一个新床，一套新被褥，金总可以派人去检查。”

“真的？”

“句句都是实话，金总，句句——”

“你老婆会同意？”大个子吐了个烟圈，嘲弄地看了小白脸一眼。

“她当然同意，金总的意见她敢不同意？”

“慢着，我可没说让你接你老妈回家，那是你们家的家务事，我不管。我开除你，是因为你不孝，你虐待你亲妈，你犯了我公司的章程！明白了？”

“老板，可是你也说过，人能知错改错就是好同志——”

大个子突然笑了起来：“你还想当好同志？你？一会儿猫脸，一会儿狗脸，人模狗样，还想当好同志？曹胖子，你说，这样的人能是好同志？”

大个子一边扔给矮胖子一支烟，一边问。原来这矮胖子姓曹。可这曹胖子笑了笑没说话，慢慢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过了足足有半分钟，才见两股浓浓的烟雾从他鼻子孔里缓缓冒了出来，绵绵不绝。他准是个大烟鬼。

从小到大，我见过的各种人和各种场面也算不少了，不过今天这种事，还是头一次碰上，有意思。

听了大个子的话，小白脸的脸突然苍白起来，衬得那颗亮晶晶的雨珠更加晶莹，它还一直晃里晃荡地挂在诚惶诚恐的小白脸的鼻尖上。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睛总离不开这叫人着急的水珠，盼着它赶快掉下来。可是它一点也不着急，还在那儿晃荡。

“怎么着？脸皮倒挺薄的，啊？”

“金总，我——”

那颗灿烂的水珠终于离开小白脸的鼻尖，像一道流星急急地下落，到了地面似乎还叭嗒响了一声，像是一颗铅豆子。

“金总，我——”

“王博士，你嫖娼，你包二奶，本来跟公司没关系，我也管不着，可今天说起什么是好同志，我得和你较较真儿，你敢说你没干过这些事儿？”

原来小白脸还是个博士。

“金总，我——”

王博士的脸已经如同一张白纸。

这句话还没有落地，一个湿淋淋的女人伴随着一声也是湿淋淋的刺耳尖叫破门而入，直扑向小白脸博士。我刚想上去拦住，不料这女人突然又一个急刹车，一下子停下来，定定地站在小白脸的面前，不动，也不说话，像一座泥塑，只有一串串的水珠从她脸上、身上滚滚落下。

屋子里没人说话，只听得风声雨声从大开的屋门里流进来，又流出去。

大个子似乎也觉意外，他愣了一下，然后兴趣盎然地在这女人和小白脸之间看来看去，一声不出。曹胖子依然不慌不忙地吸着烟，脸向着窗子，好像在欣赏雨景。小白脸在女人的凝视之下，脸色越发惨白，那是真正的雪白，比雪还白。又一个突然，在一声清脆的响声里，浑身湿透的女人飞快地打了小白脸一记耳光，打得非常熟练，好像专门练过这门功夫。一刹间，我想冲上去拦一拦——我到底还是这儿的主人，不能由着不明不白的人在我这里打架闹事。

这时候大个子站了起来，对我笑了笑说：“咱们别管闲事，谢博士，过两天我再来找你，我的事还没完。”他一边说一边往门外走，话说完，人也走出了门外，曹胖子也像影子一样跟了出去。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小白脸一跃而起，叫了一声“金总！”就飞出门去，那个女人愣了一下，跺了下脚，低声骂了句什么，也跟着飞身出门，在跨出门那一瞬间，还把我的房门咣地一声关上，好像整个房

间都颤了几颤。这女人怎么这么有劲，从前是个铁饼运动员？

房间里一下子静了下来。

只有夏天的暴雨把窗子敲得叮当响，一阵密，一阵疏。

不过，刚才在我房间里发生的那一幕戏，好像没有结束——隔着窗子，我看见小白脸和打小白脸嘴巴的女人一前一后追上了金老板，就站在人行道上争着和他说话。大个子老板站在曹胖子撑开的一把大黑伞之下，只听了几句，就转身进了路边一辆黑色轿车。曹胖子收起伞，也敏捷地钻进车里，很快启动了车子。不到十秒钟，这辆黑车就完全消失在雨雾和车流之中。

当我转过头再关心小白脸和那个女人的时候，才发现这两个人的激情戏还在继续：想不到，这两个人争执了几句之后，女人又开始打耳光，并且是左右开弓，不过，那应该很清脆的噼噼啪啪的声音，被淹没在雨声里，只能意会，看个默片。更让我惊讶的是，小白脸竟然由着女人不停地打几下，说几句，不躲不闪，一动不动。这场演出坚持了大约五六分钟才终于收场。最后还是小白脸拉起女人的手，一起往不远的十字路口跑过去，很快转过弯，也终于没了踪影。

3

我天生是夜猫子，所以，漫漫长夜才是一天里最好的时间。只有在夜里，你才能安安静静地享受时间——躺在床上看书，或者，像拼图一样，把很多活动胡乱拼贴在一起：听音乐，上网找人下棋，打电话，去酒吧喝闷酒，深夜在街上闲逛。这很乱七八糟，可是，这乱七八糟是你自己的。

不过今天，我不想看书，也不想听音乐，更不想上网。

我站在窗前，看着雨水在玻璃上流淌成的水幕，脑子里乱哄哄的。大个子金老板、小白脸，还有那个保镖曹胖子、练就左右搏击这门奇奥功夫的泼妇，这几个人像走马灯一样，总在我眼前转。

今天晚上可太有意思了，完全是一集电视连续剧，可惜没头没尾，如果每天晚上上一集，一直演下去就好了。

我想出去，到雨地里走一走——房子里太闷，可是手机响了，于是，列侬“Imagine there's no heaven”的歌声一下子压过雨声，在房间里盘旋回绕。

“请问大宝在吗？”

“在——当然在！”

“那二宝也在吗？”

“当然也在啊。”

“那我是先和大宝说话，还是和二宝说话？”

这个带着笑意又清凉的声音，一下让我想起半年前的一个美丽无比的黄昏。

4

那是在九寨沟。

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借口和朋友们分了手，终于自己一个人在珍珠滩左近游荡起来。那帮小子一定正在为我的“掉队”着急，不停地瞎猜，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把我给“丢”了。我可不管，尽情享受一个人独自乱跑的乐趣。

天色有点暗了，四周寂寂的，一个人没有，只有红黄相间的秋叶在远山上妩媚，让我想起马松的诗：我与花平分秋色，一灿一烂。

重新回到紧贴着水面，用长长的圆木铺成的小路上，我不慌不忙地领会珍珠滩的美景。其实半个钟头前我和大伙儿在这条路上已经走过一次，可是很扫兴，这伙人一边兴奋地叫喊“真美呀！”“好漂亮噢！”一边马不停蹄地往前赶，好像那“真美”不是在他们的脚下，而是在前边什么地方。珍珠滩就这样被冲过去了。这等于遇到了一个顶级美人儿，可是匆匆忙忙，交臂而过，只能倾慕于一瞥之间，连回头都来不及。现在好了，我独自与美人相处，或并肩，或携手，同行同止，相看两不厌。淡淡的暮色里，伴随着清扬的流水声，珍珠滩显得分外婀娜，目力所及，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到处是流水在浅滩上激起的银色浪花，犹如时开时谢的千万朵白菊。太神奇了，眼前是一片花海，可这海里的每一朵水菊花都转瞬即逝，又转瞬即生，如此生生灭灭，无止无休，虚无飘渺，又实实在在。

我正这么对着珍珠滩的流水发呆，有人忽然出现在我面前。这是个身材高挑的女孩，手里提着鞋，赤着足，趟着水迎面向我走来。我不由得大吃一惊，立刻跑过去叫了起来：“喂！小孩儿！你怎么在水里走？快上来！”

这时候我才看清，趟水的女孩子年纪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小，上身穿蓝白条纹相间的紧背心，外边还套了件牛仔小马甲，背着一个双肩包，下身是一条牛仔裤，可是裤腿高高地挽起来，修长的腿上挂满了晶莹的水珠，在夕阳下闪亮。

我的叫声大约吓了她一跳，但是脸上惊惶的表情很快变成一种蛮横：“谁是小孩儿？你叫什么呀？吓人一跳！”

“这是自然保护区，这地方禁止人下水，你知道不知道？”

“我刚下来，就洗洗脚，大惊小怪！”

“什么洗洗脚，赶快上来！”

“你管得着吗？我就不上去，你怎么着！？”

“怎么着？罚款！”

“口气不小，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这儿的管理人员！你不听劝阻，罚你款！”

“不就是罚钱吗？说，罚多少？”

“你还有理了？”

“别废话，说，罚多少？”

我和周璿就是这么认识的。

不过，这次的邂逅和争吵，有了一个我们都没有想到的结果——先是一起吃晚饭，后来，就在当天夜里，差不多 12 点多的时候，两个人不但已经睡到一张床上，并且一直做爱到天明。在几个小时的汗水淋漓的折腾过程里，每当我想停下来，来一点抒情的时候，周璿总是啪一声拍一下我的屁股说：“别废话！”她还时不时用手拨弄一下我那总是雄赳赳的 JJ，然后夸上一句：“真是个好宝贝！”接着又说：“你也是宝贝——一个是大宝贝，一个是二宝贝！”结果，她和大宝贝、二宝贝在第二天都起不了床，不吃不喝，昏天黑地睡了一整天。

一个多星期前，周璿去芝加哥参加一个中美城市发展和规划论坛，来过一次电话以后就杳无音信。所以，现在听到了她的声音，我真是很高兴。

“这些天过得怎么样？”

“还行吧，活动太多，也没什么太大意思。”

周璿的情绪不太好。

“喂！怎么这么说？你去的的地方是芝加哥！那可是蓝调的大本营——”

“是啊，跑了好几个酒吧了。乐队都很棒，还和两个黑人喝了酒，一个是弹钢琴的，一个是吹萨克斯的，俩人轮流上去演奏，再轮流下来一起喝酒。”

“你还和人家喝酒！”

“是啊，那感觉，太棒了。”

尽管周璿的把声调提高了一点，不再那么闷气，可我知道，她其实情绪还是不好——最近好一阵，几个月了，她一直这样，即使在嬉笑的时候，我也能在她的眼睛里看见一丝暗影，像一层郁闷的雾气。我本来还希望这次美国之行能让她换个心情，看来不行。

“什么很棒？是人还是音乐？”

“你嫉妒了？告诉你，音乐当然棒，人更棒，你不知道那两个黑人哥们儿多棒，人也漂亮。”

我当然嫉妒，可是当然不能承认。

“这有什么可嫉妒的？不就一块儿喝酒嘛。”

“这还差不多。可惜，我明天就去纽约了，要是九月时候还在这儿，就能赶上在 Grand Park 举行的爵士音乐节，你想想，整个芝加哥城，处处蓝调，夜夜笙歌，那该多有意思！”

周璿说她还要在美国呆一阵，因为她所在的调研小组还要走几个城市，考察老美的城市商业网点的规划和布局，然后她还要去洛杉矶看看她的母亲——这可不太寻常。周璿的父母早就离婚了，而且离婚以后两人双双出国，把她放在国内由姥爷抚养，虽然后来周璿母亲又把她接到美国读大学，读博，但是周璿还是和姥爷亲，认为自己是姥爷养大的。所以，她和父母的关系不太好，平时几乎不怎么来往，偶尔来往还发生冲突，然后周璿会情绪低落，很长时间云浓水暗。

现在她突然要去专门看母亲，怎么回事？

5

刚接到周璿电话时候，我像是被突然充了电，兴奋像一股潮水平地涌起，浪花四溅。可是，随着她一声“Bye!”，这些浪花也突然消失，踪影皆无。不只如此，一想起周璿和她新认识的黑人“哥们儿”一起喝酒的画面，心里还翻上来几丝凉意。

这可不行，不能让自己有这样的心境，没意思。

没有穿雨衣，也没有拿伞，我离开诊所，一头走进瓢泼大雨之中。

一片混沌的街上，行人寥寥，车如流水。

幽暗的积水在马路两侧缓缓漂流，偶尔还有小树枝、纸片和塑料袋浮上浮下，大街两边的楼房，黑黝黝的，少数窗子亮着灯，方形的光格子在雨水和雾气中挣扎着，有如鬼火；只有马路中间，热闹非常，几股车流慢腾腾地挤成一股长河，还用红灿灿的尾灯连缀成片片红潮，把这雨夜点染得生气勃勃，甚至让人觉得十分妖艳。

有几个纸烟店、快餐店和二十四小时小店还在营业，在它们明亮的灯光的透视下，粗粗的雨丝清晰可见。

我在雨中大步疾走，虽然浑身都湿透了，可是渐渐不再想念周璿，还全身暖烘烘的，很痛快。

6

早晨起来，我一边喝咖啡，一边给华森打电话。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当年我们一起背着背包在北美流浪，两个人徒步走了上千里的路。

是赵明明接的电话：“什么事？这么早就来电话？发财了还是倒霉了？”从电话听筒里可以听到盘子和碗叮叮当当碰撞的声音，赵明明肯定是在厨房里做早饭。不等我说什么，赵明明就喊起来：“喂，花子！你那一半的电话！”

“花子”是华森外号。在大学的时候，华森读书之勤奋和他生活之邈邈同样有名，有一次，系主任在会上非常生气地批评：“我们系里有个同学很‘现代派’，非常不讲卫生，不但衣服从来不洗，据说一星期才洗一次脸，刷一次牙，特别是，他吃饭用的饭盒——一学期才洗一次！这还像大学生？简直是叫花子！”系主任没有点名，但是大家都知道是在说华森，于是上百双眼睛一起向他扫过去，谁知道人家华森一点不在意，一脸笑容，神采奕奕，由于平日就是一身的超级“混搭”，被层层脏领子包围的脖子这时候得意地伸出来，头抬得很高，还特意扬了扬手里的饭盒，证明系主任所言不虚，千真万确。从那以后，华森就以“花子”扬名立万。不但如此，还有一些女同学主动去帮他洗被褥和衣服，这更让他有了“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美誉，一时名动江湖。

至于“一半儿”，是赵明明的一贯看法：华森的“那一半”不是她，而是我。不过，她对我的这个“一半儿”地位并不反感，甚至欢迎。这从下边的事实里得到多次验证：只要我隔一阵不到他们家吃饭，赵明明就一定打电话叫我过去，这意味着她会下厨做一顿佳肴美餐，名义是给我这光棍儿“补一补”。

华森明显是被我的电话吵醒的：“又是你捣乱！什么事？”

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昨天晚上发生在我诊所里的那幕精彩的戏：那个大个子金老板，那个不孝顺老妈的小白脸，还有那两个也很重要的重要角色——黑胖子保镖和打耳光很有一手的女铁饼运动员。

“那个老板叫什么名字？”

“姓金，叫金兆山。”

“这人是条大鱼，你得把他钓住。”

“这人很有意思，就是太神气活现——”

“怎么神气活现？”

“到我的诊所，还带一个保镖。”

“少见多怪！以后你见多了，就习惯了。”

华森被赵明明催促着起床吃早饭，上午还要去参加一个有关十五至十八世纪中国和欧洲贸易史的学术研讨会，匆匆放下电话就去洗漱了。但是放下电话之前，他用很严肃的语气警告说：“喂，你现在是个医生，别再拿知识分子的架子——既然开诊所，那就要赚钱，赚金兆山这种人的钱，明白不明白？”

“明白，赚钱。”

“明白就好，再见。”

7

匆匆忙忙把六支辣鸡翅和一只炸鸡腿，还有一大杯百事可乐，全都送下肚子之后，我拦下一辆出租车，直奔京华心理教育中心——晚上七点，我在那儿有一个关于“日常家庭亲密关系与心理问题”的讲座。

和往常一样，来听讲座的人不少，可是我觉得出来，也和往常一样，真正对我讲话内容有兴趣的人，是少数，很多人不过是来找点新闻。这从听众提问里就

看得出来：“谢博士，能不能告诉我们美国心理医生收入情况？”“听说美国中产阶级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有心理问题，是不是属实？”“听说美国在中学生、大学生里性非常开放，一个人和几十个同学、朋友发生性关系很平常，这是不是真的？”甚至还有人问：“现在中国人到美国去买房还有没有机会？谢老师是有什么看法？”

讲座结束之后，还有一些不肯散去的听众围上来提问，要求签名，要求留通讯处；足足费了半小时，我才好不容易从包围的人群里逃了出来。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宣武门内大街上还是车来车往，熙熙攘攘。不过，刚下了一场暴雨，空气新鲜极了，鲜得有股青草味儿；到处是湿漉漉的，沉甸甸的水分在空中缓缓地浮上沉下。街边的树上还积了不少雨滴，一有小风，就飘零下落，打在脸上，凉飕飕的。

这情景让我不想立刻回家。

从这大街向北走，到了西单以后沿着长安街向东，过府右街，过新华门，再向前走不远，就是南长街，那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也是唯一一条还保留着老北京韵味的一条街——是我最喜欢的一条街。从这街北行，沿街都是灰墙瓦舍，车少人稀，路两旁，老槐树迢迢密密，交织成了一道长长的幽廊，走在下面，郁郁森森，满目苍苍，经常抬头不见天日。如果是五六月，头上总有白色的槐树花若隐若现，一串串碎花累垂，香气袭人，这时候在这街上漫步，花的幽香，还有和香气混在一起的幽静，可以一直陪着你又走进北长街，待到了北长街的街口，这近两里地的静气和花香才缓缓收束。

出了这长街的街口，向西，是北海公园南门，再向前，是金鳌玉栋桥，这座桥粗暴地切开了京城里最大的一片烟波浩淼的水面，非常霸道；但是，如果出街口向东，是景山前街，街南是故宫，巍巍峨峨，殿阁重重；街北，是景山，以一道高高的红墙把自己围了起来，墙之外，周圈都是人行道。正是这墙，从很多年前起，成为我最迷恋的一路风景。夏天的夜晚，会有路灯在高的红墙上投下斑驳的树影，这些影子又清又浅，印在墙上，一枝比一枝安静；若是冬天，树枝的影子变得稀稀疏疏，交错纵横，或斜或直，有一种浓浓的金石味道。夜深了，一个人沿着这红墙漫步，越走越静，内心会越来越空明，你会一时间竟至于不知这里是不是人间。

——好久没有在这条路上走了。

也许是由于雨后湿漉漉的空气让我兴奋，或者是由于雨后拥挤的街道让我心烦，突然的，我很想去南长街去走走，刚刚雨后，走这条路一定有意境。

8

到了西单十字路口，我决定不走地下通道——干吗不在这么新鲜的空气里多呼吸一会儿？

红灯好像长眠不醒，死活不变绿，不过，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耐心，路边还立着几个可能和我想法一样的人，也都在等，大约也都在着急：这红灯是不是死过去了？

正在这时候，身边忽然有人说话，声音很轻：

“谢老师，我刚听了你的讲座，能和你说几句话吗？”

是个女孩子，黑发明眸，笑盈盈地看着我。

“当然可以，没有问题。”

“刚才听了你的演讲，非常有意思。”女孩用一种很轻的语调说话，很好听。
“你说在一个家庭里，一家人并不是天然就一定有亲密关系，需要家庭每一个成员都自觉去建设，你是用建设这个词吧？”

“对，是这个词。”

“建设——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别扭。”

“是有点别扭，我同意。”

“不过，我不是想说这个，”女孩笑了笑，犹豫了一下又说，“我是想说，你说现在青年人不注意和自己家人建设亲密关系，我不太同意。”

“你觉得我这看法不太对？”

“我认为不太对。”

“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地方不太对？”

绿灯亮了，女孩子看看我，向大街挥挥手：“谢老师，你往哪儿走？是不是我耽误你的时间了？”

“不，没有，下了雨凉快，我想在街上走走。”

“你往哪边走？”

“往那边。”我含糊地向东指了指。

“我也往那边走，能和你一块走走吗？”

“好啊，再说，你对我的批评还没批评完呢。”

女孩笑了起来，两个眼睛于是带了一点弯度。

“你真想听？”

“当然。”

“那好，”女孩又笑了，“一边走一边说。”

走过西单十字路口的时候，女孩轻轻挽住了我，从她的胳膊传过来一阵清凉，一种带着雨意的清凉。

“现在开始，继续批评。”

“这么欢迎批评？”

“批评使人进步嘛。”

女孩笑了起来，笑容里带着惊讶。

“谢老师，你这么正经，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正经？我怎么正经了？”

“批评使人进步——这还不正经？”

“是这样？别管，你不正经就行了。”

大概是整理思路，女孩想了一会儿才说：“谢老师，我先给你讲个真事吧，一个我的好朋友的事。”

“好，讲吧。”

“我这个朋友在家里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很麻烦很麻烦的问题。她是独生女，是爸爸的掌上明珠，她也从小就特别崇拜老爸，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她和她爸爸之间出了状况，非常纠结，连我都跟着纠结。”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谢老师，快两年了，她不敢看她爸爸的眼睛，也就是说，不敢和她老爸对视，就像这样。”

女孩站住脚步，转过身，很郑重地盯住我的眼睛看了几秒钟，然后又继续说：

“不成，怎么也不成，她就是不能正眼看他老爸，几秒钟都不成。你说，这是不是很严重？”

“是严重，可到底是为什么？一定有原因的。”

“当然有原因！”女孩忽然有点犹豫，欲言又止，“可是，我大概不应该告诉你。”

“那就不告诉我好了，没关系。”

“你就不好奇，不想知道？”

“我好奇啊，可是你说了，你不能告诉我。”

女孩子仔细看了我一眼，才说：“告诉你也行，但是你必须保密，不能乱说。”

这女孩子真有意思，她是谁，是什么人，一概都不知道，我有什么“密”可保？

“好，我一定保密。”

“从哪儿说起？简单说吧，大概两年前，中秋节，有一个客人到家来，送来一盒月饼，我这朋友趁她爸去送客人的时候把盒子打开了，结果发现月饼盒子有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几万块钱！”

说到这，女孩子摇了摇头，一时不说话。

“后来呢？”

“我这朋友的爸爸是个中学校长，这个中学很有名，他这个校长也很有名，还是全国的模范校长——”

“你朋友遇到麻烦了。”

“你明白了吧？她早就风言风语听人说，她爸这个学校走后门严重，小孩上学，给赞助费还不行，还要从校长到老师都要一层一层用钱铺路，可我这朋友一直不信，她觉得，至少她老爸不会做这样的事。”

轻轻叹了口气，女孩子又不说话了，只默默走路。

“那后来呢？”

“后来？后来发现‘月饼盒事件’是经常的，不过以前没注意。”

“那她怎么办？”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反正这之后，她再也不敢看她爸的眼睛，可是，这多纠结啊。”

“她没和爸爸谈谈？”

“谈？谈什么？怎么谈？”女孩子叹口气，一脸的烦恼，“能这么说吗：喂，老爸，你怎么干这事？这是腐败，这不正当——这么说，行吗？”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女孩子也不说话。

一直快走到新华门的时候，女孩子才开口，问我：

“谢老师，你小时候也和父亲闹过矛盾吧？”

“没有，从来没有。”

“真的？”

“我从记事起就没有了父亲，他死得很早。”

“啊，对不起。”

“没关系，没什么。”

9

夜晚的长安街华灯高照，车水马龙，潮水一样的车流塞满了宽阔明亮的马路。每一辆车子都急急忙忙，不时用短促的鸣笛，用车轮辗过路面薄薄的水层时发出的刺耳噪音，来表达自己的不耐烦。可是，这女孩子不很高的声音总是清楚地浮在这一片嘈杂之上，这真奇怪。

女孩子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冯箐。

关于名字的来源，冯箐给我解释了足足有五六分钟：这名字和箐瑟无关，倒是和风筝有关，可是当我追问究竟和风筝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冯箐说不能告诉我，因为这里有个小秘密。

当我和冯箐走到南长街的时候，我已经对她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想不到她是个记者，不过她不是北京报纸的记者，是《清江经济报》，在广东。

10

“谢老师，我们到这个茶室里坐坐怎么样？你没事吧？”

我没有注意到，原来我和冯箐已经走到西华门了。紫禁城西门的城楼，还有高耸的城墙，都躲在浓浓的夜色里，高深莫测，一言不发。南北长街也都寂静无声，行人寥寥，只有槐树上积存的雨水，时不时滴落到地上，发出清响。还有，就是眼前这个“紫藤庐”茶室，昏黄的灯光在雕花窗格上面透印出方圆不一的影子，从里面隐隐透出一点人声。

我不太喜欢茶馆，也很少进茶馆，但是冯箐的邀请此刻实在难以拒绝。

“来一壶最便宜的龙井，我们坐不长。”

刚一落座，还没等服务员把茶单放到桌上，冯箐就发了话。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干脆和直接让我很喜欢，不禁笑了起来。

“谢老师笑什么？”

“没什么，就是高兴。”

这紫藤庐的布置倒也有点匠心，以镂空花格门板相隔，隔开的小室不大，正好二三人促膝相对，而且小室和小室之间似隔非隔，空间也不显局促。

“谢老师，我想知道，你们那一代人是什么情况？你们那时候的家庭，就说你家，有你说的亲密关系吗？也需要像你说的，去建设吗？”

“这问题我回答不很合适，我的情况特殊。”

“怎么特殊？”

“我不但很早就没了父亲，而且十二岁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所以，我家家庭生活经验很少。”

“没有兄弟姐妹？”

“没有。”

“那是谁把你养大的？”

“我伯父，不过这个过程很复杂。”

好像对我更感兴趣了，冯箐一时不说话，仔仔细细地盯着我看，手里的一个茶杯，本来在她手指间缓缓转个不停，这时候也停下来，一动不动。

“那你现在呢？”

“我一个人，一口之家。”

“一口之家？你没结婚？”

“结过婚，可是已经离了。”

“你也离过婚？真的？”

“当然是真的，这没必要说假话。怎么，不信？”

冯箐想了想才说：“不是不信，我是觉得，你这个年纪的人，要是离婚，一定有比较严重的理由。”

“我这个年纪？怎么，我很老了？”

“你反正不年轻，对吧？”冯箐稍微犹豫之后，笑了一下，“我的意思是说，不管结婚，还是离婚，对你们这年龄的人，应该都是比较严肃，不像八零后这拨人，说结婚就结婚，说离婚就离婚，不管不顾。”

“也许没那么严重吧？”

冯箐作仔细状地看了我一眼，笑了笑。

“谢老师，也许我不应该问，可我还是要问：你离婚的原因是什么？能说吗？”

“查户口还查这个？”

“你不愿意说，就不说。”

“说说也没什么——”

冯箐一边给我倒茶，一边催促：“那你快说，我想听。”

事已至此，我只好说下去：“其实我离婚的原因，说到底还是些很琐碎的事，鸡毛蒜皮。”

“没关系，鸡毛也好，蒜皮也好，我都听。”

“好，那就从锅碗瓢盆说起——”

“锅碗瓢盆，为这个也能离婚？”

冯箐很惊讶。

“当然不是‘离’的唯一原因——你不是要听鸡毛蒜皮嘛！”

“好，我不打岔了，你说。”

“那就从锅说起——”

“锅？真的和锅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关系还不小。”

冯箐笑起来，然后没头没脑地说：“你这人——和别人不一样！”

“这从何说起？”

“别管，我乱说的。你还是接着讲，说锅，怎么回事？”

把笑容收住，冯箐还调整了一下姿势，身子前倾，一副要专心听故事的架势。

“我们——也就是我和我的前妻——结婚之后立刻买了房子。”

“那是在美国吧？”

“对，在加州。那时候我们两个都刚找到工作——结婚的前前后后就不说了吧。”

“对，还是回头去说锅。你看，我又忍不住打岔，这毛病老改不了！我再不捣乱了，你接着说，你刚才说到买了房子。”

“对，买了房子。想不到有这房子以后，麻烦就一个接一个。我这位太太一个癖好：热爱烹调，喜欢下厨房做香饭、做好菜。”

“这还不好？男人求之不得啊。”

“可是，她这癖好还带着另一个癖好，就是喜欢好厨具，特别是锅。”

“这有什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麻烦就出在利器的这个‘利’上。你知道我们买了房子之后第一件事是干什么？买锅！起初，她提出要给厨房配一套餐具的时候，我没在意，一个新家，当然厨房得装备一下。可是，三天之后——我们开车跑了不知道多少商店，甚至还跑到旧金山城里——我才知道原来买锅这事情是个大麻烦，差不多是一场灾难。”

“太夸张了吧？不就是买锅嘛，何至于？”

“你们家一定有锅？”

“当然有，谁家没有锅啊。”

“可是，你家的锅讲究品牌吗？有名牌锅吗？”

“锅还要名牌？”冯箐更惊奇了，“你们开车跑三天，就为买名牌锅？”

“不是三天，是整整一个多月！用一个月时间买锅，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对一个有癖好的人，其实很正常——既要买名牌，又要件件都合自己心意，还要尽可能省钱，买一套锅用一个月时间，也不算太多。”

“一个月里你们天天出去买锅？”

“那当然不至于，两三天里总会跑一趟。”

“锅很贵？”

“有的一二百美元一件，几百美元的也有。一套锅我们总共花了两千多美元吧？”

“这么贵的锅，真用它们做饭？”

“当然用啊，煎炸蒸炒，天天都用。不但用，用完之后还要洗刷干净——不是一般的干净，是要绝对干净，也就是说，洗刷之后，每件厨具都要和新的一样，要亮晶晶的。”

“亮晶晶？锅？瞎说！”

“真的要亮晶晶，不能有一点儿脏，要是有一个油斑，那就不合格，就要重洗。所以，你洗这个锅的时候，必须特别有想象力——想象手里这件东西不是一个锅，而是一件价值百万的青花大盘。”

“那不可能！经过烟熏火燎，什么锅都不可能彻底洗干净。我是从小就是家里的专职刷碗工，我知道。”

“你那是一般的锅，如果锅的材质是优质的不锈钢，很不一样。”

轻轻皱了一下眉，冯箐一时不再说话，拿起茶杯慢慢一口一口地啜着茶水。忽然，她笑着说：“我猜，这洗锅的活儿一定是你专职了？”

“不错，前后干了半年多。”

放下手里的杯子，冯箐又盯着我仔仔细细地看，好像要从我的脸上搜寻什么重要的信息。

“我明白你为什么离婚了。”

冯箐突然说，一边说一边还慢慢点了点头。朦胧的灯光下，她的眼睛罩在阴影里朦胧不清，只在耳边有一缕稍稍卷起的细发闪闪发亮。

11

离开紫藤茶室，我和冯箐又一直走到北长街的路口才分手。临别之前，冯箐问我以后能不能再见面，我说可以，然后她拦了一辆出租，走了。

我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多，难道我和这个叫冯箐的女孩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

水气蒙蒙的街道模模糊糊，远处，一只手从车窗里伸出来摇了又摇，在被街灯的光亮搅成一团灰黄的夜色里，像一只由于疲惫而飞不起来的黄蝴蝶。很快，出租车转了一个弯，消失了。

我想起冯箐说起的那个女朋友。

我眼前不断出现一个景象：爸爸慈爱地望着自己的女儿，可是女儿的眼光却一直在回避，一直在躲闪，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有如一只被惊吓的小猫，急于想钻进沙发下面，在黑暗里一边紧缩成一团，一边瑟瑟发抖。父亲觉

察到这一切了吗？发现女儿的眼睛里那些朦胧又复杂的种种变化吗？会觉察这双眼睛一直在躲躲闪闪吗？按道理，他应该会觉察到，不可能不觉察到，可是，觉察到了之后，他又该做什么？他会做什么选择？假装没有注意？还是和女儿推心置腹谈一次？可怎么谈？谈什么？他能把自己所作所为向女儿公开？大概不能，父女之间，谈这种事情？太难了。何况，愿意这样做的父亲会很多吗？不会，不会多，会很少很少。问题是，即使有的父亲能够这样做，女儿们又该怎么办？她们能向父亲说什么？

我好像看到了那双眼睛，视线下垂，惶惶不安，在苦恼的黑色漩涡中沉沉浮浮，飘飘荡荡。

我掉过了头，不敢看。

12

天又不知不觉又黑下来了。

已经几天了，一直下雨，有时候细雨蒙蒙，有时候是大雨倾盆。

窗子外面，透过水迹斑斑的玻璃，远近的灯火冷冷清清，唯有“金太阳俱乐部”几个大字依然闪着刺眼的红光。

我从书架上抽出 Robert Parker 的 *The Judas Goat*，打算和斯宾塞一起消磨这个无聊的雨夜。

想不到，门铃响起来了。

是谁？在这种时候来访，也许又是金兆山？这几天我一直在期待这个老板重新出现。

过去打开门，我不由吃了一惊：来人竟是那位被打连环耳光的小白脸。

不过，让我更惊讶的，是这人此刻的形象。

小白脸的头上、身上都有雨迹，但是笑盈盈的，气定神闲，手里还提着一支很精致的小手提箱。

“先生，找我有何事？”我板着脸，语气尽量冷冷的。

“谢博士，对不起，这么晚打搅你，但是我想找你谈个事，事情比较急。”

“请明天上班时间再来。”

“谢博士，确实有急事，不会占你很多时间。”

这小白脸到底有什么急事？会不会和金兆山有关系？

我不想拒绝这位来客。

小白脸在桌前一屁股坐下，没有马上答话，而是拿出几张纸巾，一张擦脸上的雨水，一张擦那箱子，一张擦西服上身。这么做的时候，他脸上始终笑盈盈的表情突然不见了，苍白的小脸上一片平静。

我坐在这家伙对面，静等着他说话。

小白脸把擦湿了的纸巾叠成整整齐齐的小方块儿，然后放在桌子上，这才开了腔：“谢博士，我能不能问一下，你这儿怎么收费？”

这更有意思了，这小子要干什么？

“先生贵姓？是要咨询吗？可是今天太晚了，能不能换一天？”我的回答冷冰冰的。

“我不咨询，我是想和谢博士商量个事。”

“商量事？”

“谢博士，听我先说几句，事情很重要，几句话就能说清楚。”

小白脸从已经淋湿了的西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很精致的名片盒，从中又取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我也读过博士学位，还是在北大，当然是土博士，不比你这洋博士。”

我瞥了一眼这位土博士的名片，果然，在“王颐”这个名字旁边的一长串头衔里，有“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一行字。抬起头来，小白脸盯着我，又开始微笑。

“请说，你找我是什么事？”

“我想请求你一件事，一个小事。”

看我没有反应，小白脸接着说：“谢博士，真是一件小事。我想问一下，上次我们公司金总到你这里来——想必你一定还记得——是为的什么事？是来做咨询吗？”

没想到这小白脸问这个。

窗外的雨忽然下大了，而且打起了雷。

一阵又乾又脆的响雷，在天上滚过来滚过去，似乎在寻找什么仇人。电闪总是先于雷声，那凄惨的光芒，每隔几秒，就把天地之间照得一片雪白，很吓人。从窗子望出去，远近的一栋栋楼房都在瑟瑟发抖。

“对不起，这和你没关系。”

我把这句话说得尽量干巴巴的。

“不，有关系，”不等我说完，小白脸立刻抢过话头：“是这样：要是金总有什么问题，我们这些下级知道了，也许能帮上一些忙。你是心理医生，他到你这里来，一定有什么事情，可是不便对我们这些下属说。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和金总分担，也许根本就没什么大事，很容易解决。”

“王先生，对不起，我们有行业的规矩，有我们的原则，你这要求，过分了。”

从一见这小子，我就不喜欢他。

我很想把这小白脸赶走，可是好奇心让我决定和这小子继续周旋。

“对不起，无论有什么事，请明天再说。”

我刚说完这句话，灯突然灭了。屋子里一下子暗下来，窗户外，对面的几栋楼也都没有了灯光，只有远近的街灯还亮着，在粗粗的雨丝里照射出一团团昏黄的光圈。

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想起野地里的萤火虫。

小白脸没有理会我的拒绝。卡哒一声，他打开了小手提箱，从中取出一件象牙色的椭圆形的球，用手轻轻拍了一下，那个东西立时放出一道青幽幽的光，把我的诊室一下子照得亮了起来，不过桌子、笔筒、电脑、茶杯也都染上了一抹淡淡的青色，有点像好莱坞的恐怖片。

把这青色光球我往我面前推了一下，小白脸得意地笑了笑：“新产品。”

不等我说什么，那笑脸突然一下又变没了：“喂，谢博士，直话直说，咱们做个生意，怎么样？”顿了一下，看我没有马上回话，他又立刻说了下去：“我这儿有五万块钱，现金。这样——你只要告诉我金总到你这儿是看的什么病，他都说了些什么，这五万块钱就算是给你的一笔感谢费。怎么样，可以吧？”

随着小白脸的声音，整整齐齐的一叠钱，上边还留着银行打捆的纸条子，也放着阴险的清幽幽的光，突然出现在离我不到两尺远的桌子上。

“怎么样，行不行？”

小白脸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又把钱往我这边推进了半尺。

一片大如黄豆的雨点噼噼啪啪地砸到玻璃窗上，接着是几声响雷，雨又来了。

“不行，对不起，这事情我不能做。”

“怎么？嫌少？”

两只娇嫩的手稍稍忙了一下，就又有的一叠钱立在我的桌上。我觉得自己手心有些发热，是不是我手心出汗了？好奇心让我低头看了看，手心干干净净，没有汗。可就在我低头这一会儿，桌子上的钱又无声无息地高出一层，在青幽幽的光芒下，像一座妖气四射的魔塔。这到底是 TMD 多少钱？

这小白脸是什么人？这么邪门？

“王先生，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我在干什么？”小白脸稍稍愣了一下，“谢医生有什么看法？请指教。”

“你这不是一般的生意，是买情报，高价买情报——买有关你的老板心理健康的情报。”

“情报？这也算情报？”

“当然。”

“请问，如果这算情报，它有什么用？”

“这个我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花这么多钱，去买一点用处没有的东西，可能吗？”

我又看了一眼桌上那叠钱，是多少，十几万？

“谢医生，就算是我买情报，你能不能设想，我可以光明正大地利用这情报？”

“王先生，这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说到设想，可你有没有设想，我完全有可能把今天晚上的这生意告诉金总？”

我从桌子上拿起金兆山留下的名片，晃了一下。

小白脸的表情凝重起来，性感的嘴唇闭得紧紧的。

“谢医生，你这是威胁我？”

看了我一会儿，他突然微笑起来。

我摇摇头：“说不上，我说的是‘设想’”

小白脸点了点头，又没有任何表情地看着我。

“谢医生，”他忽然开了口，“打开天窗说话吧，你是不是觉得价钱不合适？我还可以加价，钱不是问题。”看我没有反应，小白脸还是先开口，一边用手又把那叠让我心跳不断加速的钱向我推进了半尺。

突然地，我想起不少电影里都有这样的镜头：某人不动声色地把办公桌的抽屉轻轻一拉，又不动声色地轻轻用手在桌子上一划，一大叠钱，或是一张大额支票就溜进了抽屉里，简单得很。那是什么影片？

“王先生，你别麻烦了，这事我绝对不能做。”

“绝对？”

“绝对不能做，我有职业道德，这事不能做。”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瑟瑟的，和平时不太一样。

“职业道德！”

小白脸笑起来，而且笑声十分怪异，吓了我一跳。这小子平时说话，嗓音里就有股柔和的软音，可是又被他嗓音里的另一种尖锐的金属声平衡，让人听起来不舒服。

“对，职业道德。”

我立起身来，准备逐客。

笑声戛然而止，接着，那摞钱也一下子消失了。

小白脸收起那个青光球，卡哒一声闩上了那只小皮箱，站起来，笑盈盈地看了我一眼，转身走到门前——开门，关门，出门——活像个鬼影子，一下就不见了。可是，我觉得那个笑盈盈的脸没有走，浮在半空，还带着几分妩媚。

13

窗子外，雨停了，天空漆黑，只有“金太阳”那变幻不停的霓虹灯，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声嘶力竭地反复宣布自己才是都市黑夜的真正主人。

我一动不动地在黑暗里坐着，不知道为什么，小白脸的消失让我觉得眼前十分空旷，灰暗中，有东西时隐时现——那是小白脸那双白得耀眼的手，还有着双手变戏法一样变进变出的几叠厚厚的钱。

为什么我眼前总出现这些钱？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社会学，可是常去英文系听课，在一位莎迷教授影响下，有一阵子狠迷莎士比亚，没日没夜地把老莎的所有剧作都囫囵吞枣地读了一遍。在《雅典的泰门》里，老莎有这样一段台词：“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为尊贵……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癩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当年读到老莎这段话，就总让我想起“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老话。关于金钱，老莎说了半天，其实还不如中国这一句民间老话更有力量——当时还忍不住写下了很长一段笔记，对此大加议论，讨论金钱和道德的复杂关系。那是我到美国的第二年，正是野心勃勃的时候，由这笔记我还制定了一个更大的写作计划：写一本《金钱的道德史》，赶超齐美尔的《货币哲学》。

这都不过是十几年前的事，可好像已经非常遥远了，好像是远古时代。今天晚上小白脸像变戏法一样变出的一叠一叠的钱，不知道为什么，让我一下想起当年要赶超 Georg Simmel 的雄心壮志。作为准备，那时候我看了不少材料，历史的，文学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所以颇为自负，觉得自己已经把金钱和道德的关系摸了个清清楚楚；可现在，面对眼前的一片灰暗，还有在这暗中时隐时现的一双白得耀眼的手，还有这双手变进变出的几叠厚厚的钱，我突然觉得，面对金钱和道德，自己很虚伪。

不过，莎士比亚就不虚伪了？

14

一连几天，我的诊所都没有人登门，真正是门可罗雀。

小白脸再没有露面，金兆山也没有音信。

我给华森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小白脸到我诊所夜访的故事，这引起华森的兴趣，很仔细地问我事情的经过：小白脸对金兆山的关心，他所要做的奇怪“生意”，还有那几叠闪着青幽幽光芒的人民币。

“看那些钱，你一点不动心？”

“动心啊，要再讲讲价，他出价还能更高。”

“这小子是个阴谋家，你得小心。”

我和华森一致觉得无论金兆山，无论小白脸，大概都不会从此匿迹，他们多

半还会出现。华森约我周末到他家去，把这两天我在诊所碰到的这些怪事再仔细讨论一下。

凤凰

欧阳江河

1.

给从未起飞的飞翔
搭一片天外天，
在天地之间，搭一个工作的脚手架。
神的工作与人类相同，
都是在荒凉的地方种一些树，
炎热时，走到浓荫树下。
树上的果实喝过奶，但它们
更想喝冰镇的可乐，
因为易拉罐的甜是一个观念化。
鸟儿衔萤火虫飞入果实，
水的灯笼，在夕照中悬挂。
但众树消失了：水泥的世界，拔地而起。
人不会飞，却把房子盖到天空中，
给鸟的生态添一堆砖瓦。
然后，从思想的原材料
取出字和肉身，
百炼之后，钢铁变得袅娜。
黄金和废弃物一起飞翔。
鸟儿以工业的体量感
跨国越界，立人心为司法。
人写下自己：凤为撇，凰为捺。

2.

人类并非鸟类，但怎能制止
高高飞起的激动？想飞，就用蜡
封住听觉，用水泥涂抹视觉，
用钢钎往心的疼痛上扎。
耳朵聋掉，眼睛瞎掉，心跳停止。
劳动被词的膂力举起，又放下。
一种叫做凤凰的现实，
飞，或不飞，两者都是手工的，
它的真身越是真的，越像一个造假。
凤凰飞起来，茫然不知，此身何身，
这人鸟同体，这天外客，这平仄的装甲。
这颗飞翔的寸心啊，
被牺牲献出，被麦粒洒下，
被纪念碑的尺度所放大。

然而，生活保持原大。
为词造一座银行吧，
并且，批准事物的梦幻性透支，
直到飞翔本身
成为天空的抵押。

3.
身轻如雪的心之重负啊，
将大面积的资本化解于无形。
时间的白色，片片飞起，
并且，在金钱中慢慢积蓄自己，
慢慢花光自己。而急迫的年轻人
慢慢从叛逆者变成顺民。
慢慢地，把穷途像梯子一样竖起，
慢慢地，登上老年人的日落和天听。
中间途经大片大片的拆迁，
夜空般的工地上，闪烁着一些眼睛。

6.
人类从凤凰身上看见的
是人自己的形象。
收藏家买鸟，因为自己成不了鸟儿。
艺术家造鸟，因为鸟即非鸟。
鸟群从字典缓缓飞起，从甲骨文
飞入印刷体，飞出了生物学的领域。
艺术史被基金会和博物馆
盖成几处景点，星散在版图上。
几个书呆子，翻遍古籍
寻找千年前的错字。
几个临时工，因为童年的恐高症
把管道一直铺设到银河系。
几个乡下人，想飞，但没机票，
他们像登机一样登上百鸟之王，
给新月镀烙，给晚霞上釉。
几个城管，目送他们一步登天，
把造假的暂住证扔出天外。
证件照：一个集体面孔。
签名：一个无人称。
法律能鉴别凤凰的笔迹吗？
为什么凤凰如此优美地重生，
以回文体，拖曳一部流水韵？
转世之善，像衬衣一样可以水洗，
它穿在身上就像沥青做的外套，

而原罪则是隐身的
或变身的：变整体为部分，
变贫穷为暴富。词，被迫成为物。
词根被银根攥紧，又禅宗般松开。
落槌的一瞬，交易获得了灵魂之轻，
把一个来世的电话打给今生。

7.

人是时间的秘书，搭乘超音速
起落于电话线两端：打电话给自己
然后到另一端接听。但鸟儿
没有固定电话。而人也在
与神相遇的路上，忘记了从前的号码。
鸟儿飞经的所有时间
如卷轴般展开，又被卷起。
三两支中南海，从前海抽到后海，
把摩天楼抽得只剩抽水马桶，
把鹤寿抽成了长腿蚊。
一点余烬，竟能抽出玉生烟，
并从水泥的海拔，抽出一个珠峰。

8.

升降梯，从腰部以下的现实
往头脑里升，一直上升到积雪和内心
之峰顶，工作室与海
彼此交换了面积和插孔。
一些我们称之为风花雪月的东西
开始漏水，漏电，
人头税也一点点往下漏，
漏出些手脚，又漏出鱼尾
和屋漏痕，它们在鸟眼睛里，一点点
聚集起来，形成山河，鸟瞰。
如果你从柏拉图头脑里的洞穴
看到地中海正在被漏掉，
请将孔夫子塞进去，试试看
能堵住些什么。天空，锈迹斑斑：
这偷工减料的工地。有人
在太平洋深处安装了一个地漏。

9.

铁了心的飞翔，有什么会变轻吗？
如果这样的鸟儿都不能够飞，
还要天空做什么？
除非心碎与玉碎一起飞翔，

除非飞翔不需要肉身，
除非不飞就会死：否则，别碰飞翔。
人啊，你有把天空倒扣过来的气度吗？
那种把寸心放在天文的测度里去飞
或不飞的广阔性，
使地球变小了，使时间变年轻了。
有人将飞翔的胎儿
放在哲学家的头脑里，
仿佛哲学是一个女人。
有人将万古交给人之初保存。
有人在地书中，打开一本天书。

10.

古人将凤凰台造在金陵，也造在潮州，
人和鸟，两处栖居，但两处皆是空的。
庄子的大鸟，自南海飞往北海，
非竹不食，非泉不饮，非梧桐不栖，
不知腐鼠和小官僚的滋味。
李贺的凤凰，踏声律而来，
那奇异的叫声，叫碎了昆仑玉，
二十三根琴弦，弹得紫皇动容，
弹断了多少人的流水和心肠。
那时贾生年少，在封建中垂泪，
他解开凤凰身上的扣子，
脱下山鸡的锦缎，取出几串孔雀钱，
五色成文章，百鸟寄身于一鸟。
晚唐的一半就这样分身给六朝的一半，
秋风吹去尘土，把海吹得直立起来，
黄河之水，被吹作一个立柱。
而山河，碎成鸟影，又聚合在一起。
以李白的方式谈论凤凰过于雄辩，
不如以韩愈的方式去静听：
他从颍师的古琴，听到了孤凤凰。
不闻凤凰鸣，谁说人有耳朵？
不与凤凰交谈，安知生之荣辱？
但何人，堪与凤凰谈今论古。

18.

为最初一瞥，有人退到怀古之思的远处。
但在更远处，有人投下抽丝般的
逝者的目光。神的鸟儿，
飞走一只，就少一只。
但凤凰既非第一只这么飞的鸟，

也非最后一只：几千年前，
它是一个新闻，被尔雅描述过。
百代之后，它仍然会是新闻，
因为每个时代的新闻，都只报道古代。
那么，请将电视和广播的声音
调到鸟语的音量：听一听树的语言，
并且，从蚜虫吃树叶的声音
取出听力。请把地球上的灯一起关掉，
从黑夜取出白夜，取出
一个火树银花的星系。
在黑暗中，越是黑到深处，越不够黑。

19.

凤凰把自己吊起来，
去留悬而未决，像一个天问。
人，太极般点几个穴位，把指力
点到深处，形成地理和剑气。
大地的心电图，安顿下来。
天空宁静得只剩深蓝和深呼吸，
像植入晶片的棋局，下得斗换星移，
却不见对弈者：闲散的着法如飞鸟，
落子于时间和棋盘之外。
不飞的，也和飞一起消失了。
神抓起鸟群和一把星星，扔得生死茫茫。
一堆废弃物，竟如此活色生香。
破坏与建设，焊接在一起，
工地绽出喷泉般的天象——
水滴，焰火，上百万颗钻石，
以及成千吨的自由落体，
以及垃圾的天女散花，
将落未落时，突然被什么给镇住了，
在空中
凝结成一个全体。

随黄公望游富春山（选章）

——入山幽致叹无穷

翟永明

一

1350年，手卷即电影
你引首向我展开
绢和景 徐徐移动
镜头推移、转换
在手指和掌肌之间

走过拇指大小的画题
走进瘦骨嶙峋的画心
我变成那个小小人儿
栖身山中
随黄公望 拜无用师 访富春山
那一年，他年近八十。

“不待落叶萧萧 人亦萧条
随我走完六张宣纸，垂钓富春
那便不是桑榆晨昏”

我携一摞 A4 白纸，蓝色圆珠笔
闯进剩山冷艳之气
落叶萧萧 我亦萧条
剩山将老 我亦将老

三

一片浩渺，千年空白
目光摇过三分之二的位
有形无形 严子陵都在这里钓鱼
我们熟知的中国故事：
政治、道家、渔樵、归隐
多少人争相说过，我们时时记起

近处连绵之山，远处空无一物
随黄公望，拄杖、换鞋
宽衣袖手 步入崇山峻岭
“问道富春山 寻源师造化”

十二世纪的绘画经验
将要变成二十一世纪的广告语
十二世纪散点透视的邻里人家
变身为二十一世纪重叠的城市通衢
十二世纪向上生长的绿色
化为二十一世纪垂直超高的大厦
近处仿真效果 远处景观林立

五

山被推远，慢慢隐入云端
生于南宋，南宋亦被推远
望临安，满城尽为瘦金体
望燕京，燕京全是蒙古汉
那是我们的历史，政权更迭的历史
不是朝代的问题，那是族群的问题
踩着教科书缓缓行
我想起文天祥、李清照、赵孟眺
不世出的人物，今天再也不出
一切皆为碎片，从人到物
新诗铸就 织成围脖
140个字不能让
我和十二世纪，摩擦生烟
点亮一片密林的颓废

远山、近岸、村庄、小路
四座山峰，两片水域
次第在我眼前展开
平远、阔远、高远
我上上下下，领会古意
有人在一旁说：
“中国望向过去
美国望向未来”
图像“过去”
政治含义的“过去”
在同一幅画的肌理中
微微侧转 成为线性的笔墨
交替鼓舞

我在“未来”的时间里
走在“过去”的山水间
过去：山势浑圆，远水如带
现在：钓台依旧，景随人迁
过去：先人留下有机物

现在：三尺之下塑料袋
黄公望的脚印从常熟一路走到台湾
我的脚步 纸上一走三百六十年

六

让我摒息一会儿
长啸半声
让氤氲之气落入肺中
开出儿童之心

让我出神一小会儿
跳脱焦虑至纸上
让图像的威力固定在点、线、面
阔笔晕染出一段潜修时间

让我气馁一小会儿
专注半晌
让岩石、坡地、枯干的意象
进入身体，疏密有致

让我吐气一小会儿
把百骸松开
一呼自丹田
再呼上云端

十

黄昏降下来，小路时隐时现：
一颗树、一身孤、一叶轻，
一窟鱼、一溪绿、一石脆，
一只鸟懂得一种沉默，
高士出现了，虚步跨过石桥
我与他一擦肩
行过数千年
同一座山，同一条路
同一布置，拜自然
拜丹青之峥嵘
大树小树，一偃一仰
古人今人，一前一后
随黄公望，走进走出
一段临场经验

十二

每天，上千句话语中
有一百句谎言
我们拥有的 43 块肌肉
可以激起脸上的上万种表情

这是我成年后读到的科学数据
“每天”，你是我的测谎仪

坐在人工湖边，意识却远遁
肉身扎进地气 与它贯通
红嘴黑天鹅飘然来去
坐中有阿潘，言谈唯白夜
两只金鹅游出四条弧线
唉，且住，还是谈谈那幅画：

收拢，置于火中
收藏家焚以为殉
这是一个中国式公案：
火，带走人的万般无奈
后世，享用他的千重风采

“死亡也有牵挂 不得安宁”

一幅画的命运比创造者更有力：
战争、烽火、王侯公卿的私囊
卷起千山白鹤
皇帝的宽袍大袖
击破一地沙砾
醉卧花下，题款补缺
皇朝坍塌，文人流徙
一幅纸画断成两截：
一截在东，一截在西
一朝合璧，遂成政治

还是随黄公望 走荒寒之境
洒落一路骨相气韵
从移步换景的步幅中：
中年走过，老年走过
生涩走过，劲气走过
老辣之心与老迈一同走过
溢出画面的二度空间
劈面兜住了我

随黄公望，走过前景
走过中景，再走过远景
流动之步，成为手段：
1350 年的慢走，走成一段微电影
1350 年：溪山清远
成为 2012 年的当代题材

十五

大红春节 龙呵凤呵浮现
大红 是当代颜色
中国红——孤独脆弱的胭脂
是你们需要的

烟火寞落，依稀看到经济萧条的冲天炮
战争，又见战争身影
几个狂人喧嚣在
互连网的每一个节点 跳跃
雾霾 Pm2.5 吞噬了江山社稷
“纸上的行走是有氧呼吸”

铺开台布，拿出镇纸
让我凝神聚气
一头扎进黄公望的三度空间：

山川莽莽，最为元气
我们没来之前，这里无形无迹
江山不用起稿，竟无一丝俗气
脚掌踏入之前 青苔如衣
目光如狼毫 挥舞有致
走兽花鸟悬在古人的身边

青色霾色之纸 落下记忆
一层若游丝 二层若粉末
三层四层若皮肤细细揉动
五层六层制香如兰
七层八层吸纳晴川烟霭
九层全部攒入我眉心 化为能量

二十四

层层叠叠压下来的梦
渐渐压紧我
像一把古代绢扇

渐渐的黑暗中
满满坐着 居心叵测的人
偷偷哭泣 泪水寻找每个人的眼睛
咯咯作响的关节
让我心烦意乱
我的眼光被改变
齐齐载向那个具体的东西

有过多种可能，你只告诉我们一种：
无限？谁要谁的无限？
时间不再要紧，永恒向哪里奔去？

一幅长卷如此说：
胸中丘壑如此说：
江山并不多娇，人心多娇
一个问题 让我身重如山
另一个问题 让我神轻若羽
朝谁说“好吧”
哦，谁在说“如此作结”：

阿翁下笔补秋岭
淡韵扫之沙地前
委曲千山共渺濛
得意数枝效庭檐
风来润毫麻皮皴
墨破含山砚头掩
几年归此三丈许
一朝合壁百世传

万寿（选章）

西川

.....

左手耍板斧、右手耍宝剑
——黑旋风也做不到——
连黑旋风也做不到的好汉，真胡子，全身盔甲纸糊的——

师傅说，把戏唱好，
能把《三国志》唱成《三国演义》
这个国家就有救了。

于是唱戏的人，脚踩云底靴，
唱出了英雄时代，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
他那呼啸山林的嗓子，回荡，

招来鸟雀，像死魂灵。
它们看看而已，听听而已，
不敢闯进乱哄哄的戏园子。

戏园子里外的游手好闲之徒招不得。
喝茶的，嗑瓜子的，叫好的。
沉默不语的民间社会。

扮作小媳妇的人挺不出乳房却准备登场，
头戴点蓝银凤冠，手持红缨枪又叫长矛。
为假女人叫好，乃戏园子传统之一。

这黑道的必经之路：戏园子。
黑道的戏园子传统与白道的戏园子传统
其实没什么两样。人多人少的问题。

* * *

砍头。
刽子手铁塔般站着，古老职业的骄傲的继承人——
骄傲得脸撑圆，肚子挺出腰带。

可兹骄傲者非砍头这一行，
但这一行太古老，残酷 却是文化的一部分。
“晚岁为诗欠砍头”——什么人的疯话？

郁郁寡欢者铁了心肠，却活着。
那被砍头的人跪着，表示服从，表示愿意配合刽子手，
而雪花飘下六月天。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互配合的关系。
在不平等中相互配合需要在下者的牺牲精神。
不能不说这有点儿伟大。

伟大而被砍头——
看砍头的人中有人满意：
达·芬奇面色冰冷混在人群中——

见过被吊死的，还没见过被砍头的。
他会怎样疼？疼多久？
画家的天职不是同情。

其他人围拢，
只为看到头颅被怎样砍下，怎样在地上滚动，还眨眼睛。
即使知道柿子怎样被摘下依然有必要看清人头如何被砍下。

叫好声准备妥当。砍头。
先试试砍蚂蚁的头，砍蜻蜓的头。
避免被砍头就得高飞在天上——砍不着小鸟的头。

而失败者，探测到历史伦理的最深处。
菜市口 如今哄卖黄金的所在，
一个寻找自己头颅的无头鬼将别人的脑袋一脚踢开。

* * *

小鸡巴头一点儿胭脂红。
小灯笼里的小火苗照着个小小的读书人。
黄色小说装点伟大文明。——只有自己人知道。

弹古琴高山流水可以正心诚意不错。
弹三弦的不懂得正心诚意就相信了阶级斗争。
既不会正心诚意也不懂阶级斗争的读黄色小说熬夜到天明。

《如意君传》文辞典雅，不是《花花公子》的文风。
《灯草和尚》想象力发达，爱说色情笑话的傻逼们可以休矣。
《痴婆子传》像《自我主义者》，都是心理小说的峰巅之作。

文明的后背身，就像月亮的后背身。
焚书的火已经点着了——不读就来不及读了。
《四书》、《五经》也一样——不读就来不及读了。

康有为作《大同书》，娶小老婆，
泛舟西湖复活了苏东坡泛舟西湖的情景。
文明的两面：大老婆和小老婆，有如孔孟之道和黄色小说。

不足与人道也。
事实正如此。
国家越大犄角旮旯之多越掩盖不住。

孔夫子一生充满来不及的感觉。
“朝闻道夕死可也”说给那些时刻感到来不及的人。
用天道治理国家从来没有来得及实现过。

* * *

我在自家院子里夜观星象，那边观象台上值班的小吏心胸狭小。
满天星斗对他来讲说明不了什么。
培养了幽默感，丧失了庄严感。

秦始皇驾崩时的星象与汉武帝驾崩时的星象一样吗？
都是大皇帝而没有一样的星象挂在天上这是怎么一回事？
张子房、诸葛亮、刘伯温这些鬼机灵被编来编去编成了骗子。

唱戏的小舞台，简单的道具，桌子和椅子
据说是传统。繁星满天据说也是传统，
月明星稀据说也是传统。

骗子们呼风唤雨，乌云是为骗子们准备的。
老实人只会歌颂大晴天。
老实人里出不来刘邦、刘备和朱元璋。

亚历山大大帝的星象图只管到克什米尔，
并且是在亚历山大活着的时候；
克什米尔人的星象图不同于福建人的星象图。

没人问我心胸狭小的形而上学依据是什么。
我夜观星相，国富民强的星象是什么？
江南制造局里翻译数学书的人不懂星象学。

皇上有难的星象。“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皇上在乾清宫揉眼睛。
大清国的近视眼在心底呼唤工业文明。晚了。没陛下什么事。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吧，用吧。
钦天监里的天象仪转不动了。一堆老古董
科学价值低于古董价值。古董价值与股票价值此消彼长。

* * *

别人的大同世界推进到家门口。
措手不及的感觉。
上海海关大楼上的钟声如同寒山寺里的钟声。悠扬。

海关大楼里坐着忠心耿耿的英国人，
罗伯特·哈特。
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外国人傍着青花瓷打盹。

英国人盗版青花瓷图案不觉得欠谁，
世界主义者不欠谁。
黄浦江上驶船的老汉不是世界主义者。

1789年，法国大革命，停泊在黄埔村港口的外国船只：
英国船61艘，美国船15艘，
荷兰船5艘，法国船1艘，丹麦船1艘，葡萄牙船3艘。

后来北洋水师里长官下口令使用英语。
香港人喊警察“阿Sir”。电影导演在片场喊：“Cut！”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英国人里也有好的。彬彬有礼。
庄士敦，皇上的老师，虽然反动但对皇上忠心耿耿。
就像郑孝胥，虽然喜欢日本人但对皇上忠心耿耿。

庄士敦回到伦敦，升黄龙旗在自家院子里；
在黄龙旗下著书立说，英国国王管不着。
邻居们小声议论。私有制的好处是容纳怪癖。

* * *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吾皇三百二十二人中也有好的。
吾皇宽宏大量，把宣武门的一小片土地卖给了利玛窦。

利玛窦穿儒服，徐光启有面子。
康熙道：“难道我们满洲人在祭祀中所树立的杆子
不如尔等的十字架荒唐吗？”

艾儒略不得不瑟瑟发抖。
他写完《职方外纪》，也就写尽了天下的边边角角，
只是未写到脚下生虱子的土地——这不是他的使命。

艾儒略瑟瑟发抖，请求上帝饶恕自己不务正业——
他没能广布福音，
却殚精竭虑为中国皇帝尽了点“绵薄之力”。

尽管已在儒雅而野蛮的公子王孙间混得一个虚名，
艾儒略还是瑟瑟发抖。
他收起笔墨纸砚，同时收起他的怪念头。

野蛮人没有到来。野蛮人就在身边。
瑟瑟发抖的艾儒略手握冰凉的白银十字架，
跨上谦卑的小毛驴，一颠一颠，一直走到坟墓里。

康熙道：“尔等可常来朕前，朕要开导开导尔等。”
耶稣会士全是间谍，学问好，尤其数学好得很。
吾皇数学亦好得很，但弄不懂耶稣、孔子谁更有本领。

为了安全起见吾皇将《七克》的作者庞迪我驱赶到澳门。

* * *

鸦片在印度装船。
英国议会里关于向中国贩卖鸦片是否道德的辩论。
帝国主义的强词夺理。多年以后电视里的布莱尔能言善辩。

民主制度、议会制度鼓励雄辩术。
撰写《雄辩术》的亚里士多德暗地里热爱英国人的光荣革命。

精英里的精英，柏拉图，以对话的形式自言自语。

政治，在中国，老生常谈和笨嘴拙舌。

“君子敏于行而纳于言。”

“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

戚戚小人们的社会贡献被忽略了。

戚戚小人们听戏，受教育，听相声，受教育。

戚戚小人们有正直的红扑扑的脸蛋。

“中国人写诗还可以，不过连写诗也是一代不如一代。”

“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德行样。”

“所以向中国贩卖鸦片并非不道德。”靠。

以上种种在英国的英国人和在印度的英国人都这么看。

吉卜林眼镜戴在鼻子上。

不懂诗歌的东西！

不懂诗歌的东西眼看孟买的鸦片贸易之利有了维多利亚英国的模样，

遂写诗过一过押韵的瘾，

然后散步于英印混搭的孟买，它以大清朝的白银为地基。

歧路行（选章）

北岛

序曲

为什么此刻到远古

历史逆向而行

为什么万物循环

背离时间进程

为什么古老口信

由石碑传诵

为什么帝国衰亡
如大梦初醒
为什么血流成河
先于纸上谈兵
为什么画地为牢
以自由之名

难道天外有天
话中有话
电有短路的爱情
难道青春上路
一张张日历留下
倒退的足印
难道夜的马群
奔向八方
到天边畅饮黎明
难道江山变色
纸上长城
也是诗意的苍龙

谁在圣人的行列中
默默阅读我们
谁从鎏金的风铃
从带血的鞭梢
不断呼唤我们
谁用谎言的红罌粟

照亮苍茫大地
谁把门窗的对话
卖给穿堂风
谁指挥秋天的乐队
为小桥迎娶
一盏幽怨的渔灯

哪儿是家园
安放死者的摇篮
哪儿是彼岸
让诗跨向终点
哪儿是和平
让日子分配蓝天
哪儿是历史
为说书人备案
哪儿是革命
用风暴弹奏地平线
哪儿是真理
在词语寻找火山

何时乘东风而来
从沏好的新茶
品味春天的忧伤
何时一声口哨
为午夜开锁
满天星星在咳嗽

何时放飞一只鸽子

把最大的广场

缩小成无字印章

何时从关闭的宫门

从岁月裂缝

涌进洪水的光芒

—

逝去的是大海返回的是泡沫

逝去的是一江春水返回的是空空河床

逝去的是晴空返回的是响箭

逝去的是种子返回的是流水帐

逝去的是树返回的是柴

逝去的是大火返回的是冰霜

逝去的是古老传说返回的是谣言

逝去的是飞鸟返回的是诗行

逝去的是星星盛宴返回的是夜的暴政

逝去的是百姓返回的是帝王

逝去的是梦返回的是歌

逝去的是歌返回的是路

逝去的是路返回的是异乡

逝去的逝去的是无穷的追问

返回的没有声响

我是来自彼岸的老渔夫

把风暴的故事收进沉默的网
我是锻造无形欲望的铁匠
让钢铁在淬火之痛中更坚强
我是流水线上车衣的女工
用细密的针脚追寻云中的家乡
我是煤矿罢工的组织者
释放黑色词语中瓦斯的音量
我是看守自己一生的狱卒
让钥匙的奔马穿过锁孔之光
我是年老眼瞎的图书馆员
倾听书页上清风与尘土的冥想
我是住在内心牢笼的君王
当绸缎从织布机还原成晚霞
目送落日在铜镜中流放

是晨钟敲响的时候了
是深渊中灵魂浮现的时候了
是季节眨眼的时候了
是花开花落吐出果核的时候了
是蜘蛛网重构逻辑的时候了
是枪杀古老记忆的时候了
是刽子手思念空床的时候了
是星光连接生者与死者的时候了
是女人在广告上微笑的时候了
是银行的猛虎出笼的时候了
是石头雕像走动的时候了

是汽笛尖叫翻转天空的时候了

是时代匿名的时候了

是诗歌泄露天机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

二

狂欢是奴隶与百姓的特权

他们用脚投票，用头发兴风作浪

歌声煮沸广场上的五颗星星

口号的大路通向四面八方

学生罢课，时针停在午夜时分

垂直的权力上流星飞翔

手风琴展开岁月深深的褶皱

歌手的声浪滚动石头也滚动太阳

恐惧与勇敢是同一种子

总让我们的胃疼痛

激荡的风把它们播向四方

瞬息是飞鸟转向的含义

飞鸟是瞬息持续的形象

兵临城下。乡关何处？

在街灯明灭的时刻

在古老民族年轻的胸膛

重要的是迷雾中的狗叫

重要的是交通信号灯
在无人的路口转换的忧伤
重要的是在谎言的丛林
埋伏真相的虎豹豺狼
闪电与暴雨把底片上的天空
冲洗成地下排水管道——
城市记忆超负荷的心脏

谁以自由的名义占领广场
广场就让自由沦为空话
除了革命的逻辑和虱子
和尿骚味儿和时针刀锋的血光
帐篷是被大地捆绑的鸟群
绝食在挥霍最后的口粮
谈判与农贸市场的讨价还价
让加速的时间更疯狂

救护车流动中响彻全城
牵动着每个人心肠
白昼的广场在夜里多么温暖
好像阳光透过地下缝隙
照亮那些年轻无辜的脸庞
爱情絮语与戒严警报激荡夜空
一场婚礼在纪念碑旁举行
蓝色探照灯光迎娶新娘

所有长夜都是诅咒中的期待
所有革命都是被背叛的理想
那少女脸上的隐隐泪痕
正如地图以外的秘密小径
引领我们，狂欢时学会悲伤
悲伤中学会默默地歌唱
在走出广场的危途中回头
为这世纪的落日送葬

四

西柏林与北京仅一墙之隔
除了六小时的时差

在京策尔街五十号四层①
在十二吋电视机前
一个姓周的北京小伙子
和我喝得酩酊大醉
我们正从时间中突围
醒来，太阳孤零零
有如再生于疯人院中
门后的外套满屋追逐我
镇静！袖子搂住我
扣子铐紧我，镇静！
拉链封住我呼救的叫喊
重作大地的人质

在门廊晦暗的穿衣镜
暗夜的故事大雪的闪光
在某页折角处——
城内的屠杀正在进行
穿过小门进入暗道
我牵着一位陌生的母亲
我是她遗失的孩子
——在被杀害的名单中
火光沿逃生者的链条
深入血洗的文明
在先知们云游的高处
鹰阅读山河的掌纹

回到祖辈的深宅大院
从一个梦进入另一个梦
只听见阵阵传令声
四周却空无一人
在尽头，太师椅空空
杯盏沿回廊在风中漂浮
被无形之唇啜饮
从祠堂焚香的烟缕中
一个少年向我走来
用空洞的眼睛盯着我
他头发突然白了
在门廊晦暗的穿衣镜

是的，我不承认
所有经书深渊的含义
不承认老树摇椅上
权威的天空，不承认
收割青春的银镰刀
不承认沙漏中的灵魂
不承认大海的博爱
或一滴水的怨恨
是的，我不承认
刀笔吏那砚石的舌头
不承认落日的印章
或莲花的禅梦

如果诗是历史的故乡
乡愁就是守望

①自1989年5月到9月，我应西德对外学术交流委员会（DAAD）的邀请，住在西柏林京策尔街(Guentzelstr.)50号的一个小公寓。

五

在反叛的子女出走后
在风暴突击队闯入前
在婚姻的链条之初
在命名的钟声以远
在黄昏掌灯时分

在灯光的同心圆
在雷电打造的金戒指
在霜雪铺成的白床单
在石头暗语的裂缝
在波浪争辩的堤岸

拧紧童年生锈的发条
在初恋的伤口撒盐
让两只蟋蟀在内心决斗
任蛀虫修改字典
与自我对弈的热情
照亮那心房的另一半
旋转木马的节日
追赶流水宴上的杯盏
寻访无的私人诊所
坚守有的最后防线

父亲走动的阴影
阴影中母亲的歌声
丧家狗的嗅觉
流浪汉的口袋
守夜人坚信的真理
水龙头关上的悲哀
梦游者走不出的围城
墨水瓶底干涸的海
最高形式的权力斗争

对死亡的最后通牒

命令逻辑开花的手杖

推动大树起飞的螺旋根脉

跨过感情深渊的桥

穿越时光隧道的爱

招来旋风抓狂的镇纸

禁止季节绕行的小麦

携带心事的行李

转动日夜的钟摆

忠于房门的双向铜锁

沿途刻下你星星的门牌

家

七

火车驶离那故乡的站台

向革命誓言的后方

向七十年代的暗夜行进

那儿有被埋葬的朋友

蒜的友谊，干辣椒的爱情

和心一起跳动的煤油灯

还有辗转失眠的强权

蚊子们嗜血的忠诚

衣背上汗碱的世界地图

书页掀动的战争风云
一根深入历史的逻辑
打成死结的麻绳

打成死结的麻绳
点燃了干辣椒的爱情
打谷场上星星爆裂
少女梦躺下，成母亲河
夜的子宫孕育黎明
卷烟中有乌云的味道
风暴理发师修剪小树林
稻草人是众鸟之神
征粮的马车穿过村庄
炊烟搂在一起过冬
孤单的雪橇滑出地平线
狼群拉开新月之弓

狼群拉开新月之弓
政治术语中的死亡地带
有更多的潜行者失踪
“九一三事件”^①背后
爬满蜥蜴的碑文
向前是走不出去的隘口
后有棋手布下的追兵
赤着脚丈量苦难的大地
银针探查古今之经络

药引导向权力的绝症
水井在守望天空的变化
贫困是丰收的保证

贫困是丰收的保证
反抗是尊严的保证
远离故乡是忠于大地的保证
人间苦难是爱情的保证
烧酒是血性的保证
回声是寻找方向的保证
生与死在平行并进
通向命中的弦外之音
起点：锁在心里的诗句
照亮守夜的眼睛
“我泪水涔涔，
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②

① 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伙乘飞机外逃，在蒙古坠亡。

②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

八

公元前497年至484年，孔子带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公元前493年，他与弟子失散，在郑国郭城东门外独自发呆。一郑人向子贡描述说他“累累如丧家之狗。”

你年近六十

夕阳下，白发如笔锋
歪斜的影子如败笔
直指东方的故乡
那些逆光奔跑的孩子
变成象形文字
并逐一练习发声
夜放飞千百只信鸽
在修复的战争版图上
你是残缺的部分

风追赶云的日子
路牵引醒的天空
在田地棋盘上
你与内心的王对弈
阅尽掌中的机缘
虽步步为营
总是败在自己手中
弟子如鸟兽散
当暮色在描绘历史
你是惟一的听众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沿礼教的石阶而上
你敲鼓击磬把酒壮行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坐而论道纵观星辰

“五十而知天命”

从《周易》踏上宦途

穿梭于锦衣华盖

在空旷的殿堂

你举杯邀明月和风

“六十而耳顺”

在一生的黄昏时分

你听到晨光低语的密谋

追随世代的王侯

宫殿与黄金的灯下沉

回望那起伏的山峰

你沉迷于音律

直到后人派刺客跟踪

用影子取代你

掸掉上面的浮尘

（未完待续）